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代表團出席

2012年世界大會

報告書

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行動與展望

瑞典，斯德哥爾摩 2012年7月8日~12日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編印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目錄

壹、前言.....	2
貳、會議議程	3
一、大會議程表.....	3
二、會議簡介.....	4
參、會議紀要	7
一、會議開幕致詞.....	7
二、大會文章報告內容.....	9
三、大會工作坊報告內容.....	59
肆、機構參訪心得	68
伍、心得與結論	72
陸、照片剪輯	85
附錄 臺灣投稿文章摘要	91

壹、前言

「2012 國際聯合會議」係由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盟(IASSW)、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及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共同主辦。三個團體都看到全球的社會問題及不公義事情正日益增加，認為必須通力合作，在危機當中，確保社會發展及社會工作的聲音受到關注。為達成上述目的，三方決定合作舉辦兩年一度的會議。繼 2010 年香港會議後，三機構總結會議所得，共同制定一套新的行動綱領，訂立方向去推動未來社會工作和社會發展，而 2012 年將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會議。

台灣自 1970 年加入成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會員後，對該組織之活動相當積極參與。藉由組織國內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代表團出席全球、亞太及東北亞區域會議，與國際人士交流經驗。在會議期間展示我國社會福利成果、發表社會福利論文及經驗交流，提昇我國在國際社會福利專業組織的影響力。尤其新世紀面臨全球化挑戰，新型態社會問題與差距亟需國際間促進瞭解與經驗交換，共謀解決對策。本會出席此會議，當可擷取各國社會福利精華，供國內政策規劃與實務參考。

再者，處於全球化的經濟時代，世界各國正面臨「貧富差異懸殊」的考驗，更深刻地影響處於相對弱勢的身心障礙者權益。在國家積極發展的同時，如何避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排除，並兼顧社會正義，將是社會福利決策及工作者須因應的新課題。今年 ICSW 與 IASSW 及 IFSSW 在 7 月 8 日至 7 月 12 日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聯合國際會議。本會也將與國內優秀研究人才及實務工作者組成代表團出席「2012 國際聯合會議」。

本屆會議以「社會工作社會發展：行動與展望」為主題，希望能繼續推進 2010 的行動綱領，透過本次會議發展出在社會工作實踐和研究方法、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教育及全球共同承諾與合作的具體行動步驟及實踐方式，進而促進身心障礙者之社會福祉。因此，本會將組織代表團出席會議，旨在擷取會議中有關之新知與經驗，以精進國內社福專業，並拓展我國之國際網絡，接軌國際社會，意義至為重大。

貳、會議議程

一、大會議程表

Day 1 – 7 / 8 , Sunday
08:30 – 12:00 Pre-conference workshop: The Third Sector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12:30 – 15:30 Pre-conference workshop: Teaching and Training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e
12:00 – 20:00 Registration desk open
16:00 – 18:30 Opening Ceremony & Keynote Speeches
18:30 – 20:00 Welcoming Reception
Day 2 – 7 / 9, Monday;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Equality
07.30 – 18.00 Registration desk open
08:30 – 10:30 Plenary Session
10:30 – 11:00 Coffee Break
11:00 – 12:30 Symposia and Workshops
12:30 – 14:00 Lunch Break
13.00 – 14.00 Satellite Symposia: CSA and SSR
14:00 – 15:30 Workshops
15:30 – 16:00 Coffee Break
16:00 – 17:30 Workshops
19:00 – 21:00 City Hall Reception
Day 3 – 7 / 10, Tuesda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07.30 – 18.00 Registration desk open
08:30 – 10:30 Plenary Session
10:30 – 11:00 Coffee Break
11:00 – 12:30 Symposia and Workshops
12:30 – 14:00 Lunch break
13.00 – 14.00 Satellite Symposia: Vision and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14:00 – 15:30 Workshops / Field visits
15:30 – 16:00 Coffee Break
16:00 – 17:30 Workshops / Field Visits
Day 4 – 7 / 11, Wednesday; Glob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Action
07.30 – 18.00 Registration desk open
08:30 – 10:30 Plenary Session
10:30 – 11:00 Coffee Break

11:00 – 12:30 Symposia and Workshops
12:30 – 14:00 Lunch Break
13.00 – 14.00 Satellite Symposium: EHESP
14:00 – 15:30 Workshops / Field visits
15:30 – 16:00 Coffee Break
16:00 – 17:30 Workshops / Field visits
19:00 Cultural Evening at Skansen
Day 5 -7 / 12 , Thursday
07.30 – 12.00 Registration desk open
08:30 – 12.00 Closing ceremony

二、會議簡介

2010年，主要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國際組織齊聚於香港，在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的共同主題下進行國際性的交流。這是 IASSW、ICSW 和 IFSW 在十多年間歷經多次會議後的重要團聚。而這樣的合作，是為集結多方意見後傳達一個更強大的共同綱領的最佳時間點。

在 2012 年的會議中，我們希望提前處理和演示，在 2010 年會議後，未來發展綱領工作可能需要制定和完成的行動模式 - 在實踐和研究方法方面，在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教育，並在更廣泛的全球承諾和合作的話語。

本次會議也將提供機會來討論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部門每天所面臨的問題，並確保這些問題和討論能作為實務、政策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之間緊密聯繫的重要根基。

此外，我們要揭示在制定和完成綱領的宗旨下如何行動，可能會影響人的條件，或演示在社會工作和社會發展中，社區工作如何可以持續在物理環境和社會發展下作出貢獻。在未來，我們特別要在此三個主題多加著墨：

1. 人權與社會平等
2. 環境改變與持續性的社會發展
3. 全球性的社會轉型與社會行動

◎ 人權與社會平等

社會工作的專業和社會政策的發展使命為此核心價值的根基。這些核心價值觀，必須為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教育者、實務界和學者所接受，也是社會工作的唯一目的和觀點的基礎。

人權的宗旨提供了一個為社會工作規範性基礎和社會政策包容性的形成。我們想探索規範和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的政策基礎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於：社會工作和社會政策要如何才能努力的促進尊重，保護和實現人權？

次子題包含：

- 1.1 積極及有尊嚴的老化
- 1.2 整合失功能及其掙扎
- 1.3 透視兒童的危險
- 1.4 青年及其弱點 -當前的挑戰
- 1.5 尊重靈性權利和宗教信仰
- 1.6 婦女暴力
- 1.7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者（LGBT）的權利

◎ 環境改變和持續性的社會發展

溫室效應隨之而來的是全球暖化和自然災害的增加，因此，自然環境的改變是至為重要的另一關心面向。本次主題的重點是強調人在環境的概念，並找到實施的措施。會議將討論以下問題：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的呢？需要什麼樣的行動，融入經濟發展，環境的協調發展和社會保障的三大支柱？

次子題包含：

- 2.1 災害管理：社會工作和社會發展的觀點

- 2.2對環境變化及其社會後果的本土了解
- 2.3經濟，環境和社會角度的整合
- 2.4乾淨飲水的社會行動
- 2.5社會的經濟和可持續的社會發展：本土的課題 -全球性挑戰
- 2.6可持續社會發展：研究，教育和實踐

◎ 全球性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行動

全球社會轉型需要全球性的社會行動。通過提高最貧窮國家的生活水平，我們可以限制人口增長。一億的世界人口陷入貧困，卻無法透過自己的工作加以生存。而全球金融危機亦迫使社會保護倡議的議案產生。

越來越多的移民是社會工作及社會政策行動的一個重要問題。遷徙運動從農村到城市，從南半球向北半球。據估計，約有兩百萬人在遷移過程中居無定所，而全球因都市化導致城市人口的增加比率也提升至百分之五十。

本次會議將提出下列問題：社會工作及社會政策行動如何有助於縮小區域內和區域之間的不平等的差距？社會工作和社會政策行動如何能有助於實現移民的權利和彌合跨國關係 - 作為邊界過境遷移的後果？

次子題包含：

- 3.1 對抗貧窮和發展社會保護
- 3.2 在政治與軍事衝突脈絡下的社會工作
- 3.3 移民：挑戰和可能性
- 3.4 轉型中的家庭
- 3.5 跨國社會行動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 3.6 社會媒體及其對社會的發展的影響
- 3.7 創造實踐下的組織轉型

參、會議紀要

一、會議開幕致詞

Welcome to the second joint glob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tion and impact! It is a 'joint' conference because three organizations have decided jointly to convene it. Let me introduce these three partners. The IFSW is the global federation of national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n 90 countries, representing over 750,000 social workers. The IASSW i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chools and educators in social work. IASSW speaks on behalf of 2,000 schools and 500,000 students. The ICSW is a global NGO which represents tens of thousands of organization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Globalisation is too often reduced to a financial process or considered as an economic issue. When heads of States meet to find ways to solve the continuing economic crises their agenda is mainly a matter of economics. But we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and we may ad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is why IASSW, ICSW and IFSW are working on a 'global social agenda'. A first draft was adopted at the end of the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This was a first step.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rough a consultation process within our respective memberships, but also open to larger networks, we developed a new version, and we chose Social Work Day on 26th March 2012 to launch and disseminate it. The Agenda is an evolving document as it needs to be framed in the context of both global events and the issues being considered by global and regional bodies. So it will be updated and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again.

We would like to bring these essential issues into the post-MDG process - that is to sa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set of goals for world develop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MDGs in 2015. We think we have a role to play to make new goals more people centered and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Copenhagen World Summit on Social Development held in 1995.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 development goal focused on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For that purpose, we may refer to the adoption by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in June 2012, of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global adoption of a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a path to universal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a minimum pension to people unable to work.

歡迎各位來到第二屆全球聯合會議：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的行動和影響！這是集結三個組織共同召開的“聯合”會議。在此，讓我介紹一下這三個合作夥伴。國際社會工作者協會（IFSW）為一由國家聯合的社會工作組織，遍及全球90個國家，代表超過75萬的社會工作者；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盟（IASSW）則是由諸多學校和教育工作者所組成的國際社會工作組織，由2000所學校和50萬名學生代表發聲；而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則代表了在70多個國家中，數以萬計積極參與並促進社會發展機構的一個全球性的非政府組織。

全球化往往降低金融發展過程，甚至被視為是一個經濟問題。當國家元首會晤，想方設法解決持續的經濟危機，他們的主要議題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但是，我們從經驗中得知，持續的經濟成長是無法不去關注到社會問題，甚至也包括環境議題。

這也就是IASSW、ICSW和IFSW致力於“全球性社會工作綱領”的原因。在香港會議結束時通過了初步的規劃藍圖，這是第一步。而在今年年初，通過各成員的內部協商進程，同時開啟更大的網絡，除了拓展新的視野，並選擇於2012年3月26日社會工作日加以推廣和傳播。工作綱領的內容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方案，因為它需要根據全球性事件和全球或區域機構現存問題之種種情況加以擬定，所以它會被更新，而你將有機會再次參與。

我們想將這些基本問題導入於千年發展目標過程之後--在千年發展目標後的2015年年底，世界的發展延伸轉換成一套新的目標。我們認為我們扮演一個使更多人聚焦於發展新目標，並使其與1995年在哥本哈根所舉行的國際社會發展問題高峰會議的最後宣言更為一致的角色。我們想向大家介紹側重於減少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發展目標。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在2012年6月的國際勞工大會中，透過全球社會保護指數通過一項建議，包含了普遍獲得基本服務的管道，並通過提供最低養老金給無法工作的人的議案。

二、大會文章報告內容

撰稿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安東尼組長

場次：WS01

主題：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ealth

南非愛滋 Shumani Mulaudzi, South Africa – Integrating reproductive health in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南非如何預防女性暴力，跟預防愛滋也有關。愛滋跟家暴有何關呢？南非有最高的犯罪率，1/3 女性受傷，第一次性交易是被迫的，1/9 被強暴者會報案。研究發現暴力行為跟南非普遍愛滋病的問題有連結，因為有暴力性的性交易有高度病毒感染可能性，讓孩子和女性了解家暴問題。當地組織及明星為重視這個問題，也開始談如何預防家暴。南非法律上女性有高度保障，像在家夫妻間強暴是一種罪，女性說 NO，男性硬要就是一種罪，但實際施行仍有差距。

澳洲學者 家暴及憂鬱症 Deborah Western, Australi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epression

全世界有 16-59% 女性曾有親近的人就有性侵害她們，有的國家是高達 4、5 歲以後的平均有 25% 女性受到性侵害，有的國家高達 50%，大部分是最親近的人去害她們，所以對她們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女性有 2-3 倍的可能性會產生憂鬱症。這個學者用一個自由寫作的治療方式幫助她們脫離憂鬱問題，她們可以寫日記、自傳、故意、詩，或是從單字跟幾句話開始，幫助她們發表內心問題，然後也引導她們理解不是她們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她們是受害者，是社會的問題，讓她們可以覺醒。他有提到幾個例子，他說有一個案子，女性比較大的問題就是有人會告訴她們，她們沒有說話的權力，她們被迫到一個不適合她們形的一個器皿，是一個比喻。這個不僅是寫作，也可以畫畫、油畫等，重點是讓她們脫離目前的問題，能夠看到未來。她們六週後做追蹤，發現有的女性會繼續用這個方式，有的會斷掉，若之前有寫作習慣比較會繼續，如何讓她們繼續在課程中學習，並在社會生活中用到，這是一個問題。

美國 暴力行為一直存在 Lindsay Gezinski, USA - Violence is there all the time: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female sex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ents in Mumbai(孟買), India

在印度孟買的研究，是亞洲最大的紅燈區(印度)，有二百年歷史，大部分性工作

者是人口販運，研究對象是男性客戶跟性工作者彼此的關係。訪問男性客人，先從二個比較熟悉的開始，然後透過他們的關係及性工作者的幫助，最後訪問 13 位，他們分析這個資料。13 位裡面是從 25-71 歲都有，他們在紅燈區的時間從 2 年到 40 年，有的是單純的客人，有的是親戚，有的是仲介人。為了保護自己，他們會找理由說為什麼在這個領域工作，大部分也是家暴者，但是他們覺得這個行為是合理的，大部分的客人也是貧窮，沒有很有錢，跟這些性工作一樣，他們來這邊是因為沒有錢，所以被困在那邊。覺得他們是已經骯髒，因為一些刻板印象，社會大眾對他們的看法就沒有辦法回去他們的村莊。家暴者也會找理由說為什麼會打這些女生，例：沒有辦喝酒了失控。此研究缺點是因為用滾雪球式的方式，所以可能只訪問到某一群的人，但是研究者發現要避免暴力的話需要男人的幫助，重要的是找男人跟男人講話，所以是請當地男人當訪問者，也是要徹底去對付男人一般的價值觀及對性工作者的觀念。

在分享的時間：印度經驗，性工作者有幫忙宣傳用保險套，但孟買性工作來自各地，各種不同語言，要彼此聯繫不容易，因彼此不說話，且有競爭，要一起工作很困難。

第四篇 社會保障基層網 WS019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Initiative

過去聯合國推動前幾年發展目標，先打好底層再從下往上建構，是 2009 年聯合國開始施行的案子，現在被國際勞工組織通過，各國再加入。這計畫是調整社會福利如何幫助人適應新環境，在全球暖化、經濟環境變遷下，如何調整生活，社會保障基層網是複數的，各國情形不同，健康方面有健保，其他國家有營養午餐... 社工也需要 spf，各國推動，歐盟、ngo 說服國家通知 spf，好處是簡單。已施行國：泰國有全民老人津貼、馬來西亞各部會有自己的 spf，巴西有家庭保障法案、阿根廷也有。

撰稿人：長榮大學社會工作系 卓春英老師

場次：WS003

主題：Protecting rights of elderly-values and dilemmas 維護老人權益—價值與兩難

由於死亡率的降低與平均壽命的延長，世界各國均面臨高齡化社會的問題。聯合國於 1991 年就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提出五大原則：獨立性、參與、照顧、自我實現、尊嚴，以維護老人生活品質與權益。本次大會主題之一，即為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Equality，特別關注兒童、老人、婦女、身心障礙者、移民與環境難民的處境與權益。在老人部分，當中有一專題就「積極與尊嚴老化」(Active and Dignified Ageing)分享東南亞、非洲和歐洲的報告。以下就其分組研討「維護老人權益—價值與兩難」議題作內容摘述：

1.英國的研究報告

Safeguarding older people from mistreatment : social work's ethical dilemmas
(Ash,Angie)

「積極與尊嚴老化」的基本原則就是老人擁有免於被虐待的權益，而社工在防治老人虐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2000 年開始英國政府即制定有保護弱勢成人免於被虐待的政策，但研究發現社會服務部門們社會會抵制使用此保護架構於可能受虐老人處置上，因此，本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當中的糾葛與兩難，並設法解決。研究者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社會服務部門老人保護的社工及管理者、並邀請他們參加焦點團體、直接參與觀察相關保護處置會議、以及兩年內老人保護的相關文件及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結果顯示有些因素影響社工對潛在受虐老人的處置，包括：社工本身對老人受虐與家庭暴力的察覺；資源的不足，例如欠缺對失智老人的服務；品質不佳的安置處所，這些都是社工每天必須面對的挑戰，與道德良知上的兩難。研究建議在老人保護的社工實務與政策制定面，需能關注到倫理議題。

2.澳洲的研究報告

Cost-saving or cost-shifting ?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geing-in-place' aged care policies on families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Vreugdenhil,Anthea)

依據統計粗估至 2050 年全球失智老人將由目前的 35000000 人增加到 115000000 人。近幾年澳洲特別推動「在地老化」的照顧政策，以至於居家照顧的失智老人數量多於機構照顧者，如此政策的轉移，表面上節省了政府的經費，但潛在成本

(財政與非財政面)轉嫁到照顧失智老人的家庭中的事實，卻被忽略了。本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在地老化的老人照顧政策，對於失智老人的家庭照顧者，在經濟、健康、社會各層面的影響。研究者訪談了澳洲 Tasmania 地區 12 個失智老人的家庭照顧者，當中 8 位是居家照顧，有 4 位是機構照顧，年齡由 44-88 歲，7 位女性，5 位是男性，8 位是照顧配偶，4 位是照顧父母。

研究結果顯示失智老人的照顧似投入一個蜘蛛網絡般的複雜，有多重無止盡的需求要被滿足，對於婦女照顧者而言更是蠟燭兩頭燒，在照顧父母與子孫之間，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兩難，而直接與間接成本更難以估算。建議有必要發展一套方法以評估家庭照顧失智老人的真實成本。

3. 歐洲的研究報告

Frail elderly as consumers in the care markets- challenge for citizenship ?(Valokivi,Heli)

近年來在歐洲，老人照顧服務的生產和提供，面臨快速變遷和巨大的挑戰。而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也須面對不斷改變的照顧服務和安排，不同的責任期待，自我照顧的公民和選擇市場的消費者，在變遷的老人照顧政策下，老人的公民權應被重新定義。

本報告重點在於老人服務的使用者--特別是在變遷的照顧服務市場中的衰弱老人，他們如何去應付每天的生活？他們接受何種的照顧服務？足夠和滿意嗎？他們如何應付複雜的照顧服務市場？他們希望站在何種消費地位？將由使用者觀點來研究衰弱老人的公民權。

研究資料包括，與記憶障礙老人的會談，以及在失智中心的觀察筆記，反映出在老人照顧服務市場，衰弱老人公民權該如何被執行與定義。

4. 紐西蘭的研究報告

A widening gulf-Does elder abuse practice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respect, protect and fulfill human rights? (Brook,Glynnis)

社會工作實務須具倫理及可問責，但在新自由主義社會裡，社工的社會正義原則與傳統社工實務上卻顯現兩難的處境，對於受虐老人等弱勢者需給予專業的介入，但在新自由主義社會裡，如此專業合格的介入，卻是在資源短缺不足的情況下來提供，造成專業抱負與社工實務上很大的鴻溝落差。本篇研究報告係以紐西蘭受虐老人實務工作者為對象，研究結果顯著發現，雖然專業上期待提升老人的權益，但在社會、政治、經濟面上，卻在腐蝕實務工作者在受虐老人工作上的價值、技巧和知識。

5. 葡萄牙的研究報告

Social work and violence in the elderly: Challenges to promote the rights and dignity (A case study) (*Carvalho, Maria Irene*)

世界衛生組織(WHO)和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 對於老人遭暴力都有清楚的定義，多倫多宣言(Toronto statement)更確認暴力的種類，包括，身體的暴力、心理的暴力、情緒的暴力、性暴力、財務剝奪和疏忽等。WHO 則將暴力分為幾個類型：(1).自我暴力(self-violence)：指自我虐待和自殺行為；(2).人際間暴力(interpersonal violence)：指家庭生活和社區間發生的暴力行為；(3).公共的暴力(communal violence)：包括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本研究則特別強調第二類型-人際間的暴力，發生在個人間、家庭內或家庭外，以及陌生人所造成的傷害，這類型的老人受暴者最為普遍乃眾所皆知，國際組織也呼籲各國政府應認知此問題，並制定相關法律，以防治家庭及機構內的暴力，並辦理相關訓練。本研究從老人受暴者觀點，來探討社會行動和社會工作，如何透過支持網絡來提升老人權益，以及改善居家或機構內老人的日常生活。

6. 克羅埃西亞的研究報告

Human rights and aging in two contexts :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Zagreb (*Gatin, Meri; Radica, Sanja*)

人權係屬於不分年齡的每個人，需要政府社會和公民共同維護及提升的，就是每個人不可或缺的生命尊嚴。然而，老人的權益在法律和政策面上的保障仍然欠缺，相較於其他年齡層，老翁與老婦要忍受更多的貧窮、社會排除、不適當的醫療照顧以及各種形式的歧視，這種情形在發展中的國家，例如克羅埃西亞(Croatia)更是顯見—由於其社會照顧體系未發展，社會組織欠缺功能，以及快速降低的家庭關係。本研究特別針對克羅埃西亞的 Zagreb 市作前瞻性調查，以了解人權與老化的情況。人權則設定包括個人尊嚴和安全；表達、運動、宗教的自由；適當的生活水平；公共事務的參與；社區中的政治與文化生活；資訊、教育和訓練的機會；隱私和財產權。

研究者設計問卷訪問 1000 位 65 歲以上男女老人，問卷內容包括老人是否知道自身的權利？如何理解這些權利？他們希望享有的權利是什麼？哪些權利最常被侵害？是什麼原因被侵害？如何去反映？研究目的希望能提供實證資料，供克羅埃西亞政府制定可供老人享有的適當權益。

7. 中國的研究報告

“They treat me like a maid”-Grandparents providing long term assistance to adult children’s households in urban China (*Goh, Esther C.L.*)

本篇報告針對祖父母擔任成年子女的家庭照顧及家務處理者，做探索研究，運用符號互動理論的架構，解析在中國廈門祖父母的正負向照顧經驗。由 39 所小學 1627 個樣本研究發現，祖父母們都提供長期的服務，然而半數的成年子女很少回報父母對他們的服務與幫助，此外，在運用民族誌方法直接觀察 5 個多世代家庭 6 個月以上，發現祖父母提供照顧的微妙感情變化，當成年子女對祖父母的貢獻自然表達感謝與尊敬之意，則會增強世代間的連結，若缺少這些表示，祖父母們則有被剝削利用之感，而採取容忍的態度，使得兩代之間的關係轉趨緊張。此研究發現可作為設工在中國家庭實務工作上之參考。

撰稿人：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蕭琮琦處長

場次：WS005

主題：Youth and Health

Vulnerable young people's life courses and relationships to the care system:
Effe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弱勢青年的生命歷程和照顧系統：社會政策實施成效)

Muniglia, Verginie; Rothe, Celine
University of Rennes, France

在歐洲大陸的普遍脈絡下，青年人在不安定與高風險背景下成長，他們發展出一套應對策略，然而這些策略也影響社會結構。在地方與國家政策的規範下，青年人不只發展出因應策略，這些策略促成社會融合，並在青年人的生命歷程下了註腳。

因此，這次研討會本研究將分析在法國社會與保健政策的脈絡下，弱勢青年用與不用這些政策所呈現出的生命樣貌。研究從兩個不同觀點來討論兩者之間如何互相影響，一是從個人的生命歷程，另外則是從法國地方與國家對於健康和社會政策所呈現的趨勢來說明。更精確而言，討論青年是否使用這些服務政策對他們的生命歷程有何影響，特別是從他們的自我認知角度出發。

此次會議資料源自一項研究調查，訪談 18 至 32 歲弱勢青年。研究者在此為弱勢下的定義是，在工作和居住議題上遭遇困難，有健康問題，或是缺乏經濟資本的人群。

政府訂定社會政策欲解決弱勢青年的問題，與實際上這些青年們的對政策的反應有差距，研究者的研究目標是為了呈現出真實的狀況。

撰稿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黃昱得研究生

場次：WS005

主題：Youth and Health

此場次聚焦在探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及相關因素，所涵蓋的主題有自殺預防、HIV 青少年感染者的成長經驗、精神病患的藥物順從性、憂鬱情緒。誠然，上述的社會問題在不同的社會脈絡會具有出獨有的特性，介入的理念與行動也有所差異，因此仿效他國的介入策略在可行性及有效性上都有待商榷，但在聆聽報告中筆者仍獲得許多值得參考的想法。因篇幅有限，僅選擇兩篇讓筆者有較多反思的文章進行摘要、批判與反思。

1. Title: Correl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Shanghai and
Author: Kong, Kwok, Sylvia; He, Xuesong

青少年自殺是值得社會關注的議題，其不僅反映出現今青少年不佳的心理健康外，從「人在環境中」的角度觀之，自殺也與現代家庭、社區、社會的失功能脫不了關係。因此，青少年自殺不應被視為是個人問題，在實務及研究上都需有跨系統(cross-system)的切入觀點。此篇研究以香港及上海兩地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與自殺有關的個人及家庭因素。結果指出在個人特質方面，情緒管理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無望感與自殺意念有關，而親子溝通及家庭功能等家庭因素也能解釋青少年的自殺意念。據此結果，研究者則提出若干實務策略，如透過舉辦團體課程以增進青少年的情緒覺察及問題解決能力，或是以工作坊或家族治療來修正家庭溝通模式，以期達到自殺預防之效。

此研究結果標舉出家庭系統的重要，可惜的是，研究架構並未將在青少年時期更具影響性的同儕系統納入考量。許多研究指出，與同儕互動可作為一種社會支持，個人在當中得以抒發情緒，獲得團體的認同感，不過同儕互動也可能是一種壓力來源，特別是在團體中被排擠、孤立者，如根據筆者在此次研討會發表的研究便顯示，負向的同儕互動是青少年憂鬱情緒不可忽略的解釋因素。另外，青少年為情自殺是時有所聞，突顯出在家庭之外的關係互動、親密關係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性。甫加上近年來頻繁校園霸凌事件，更標舉出學校是心理健康專業需要關注的場域。此研究僅聚焦在個人及家庭系統中，卻未談及同儕及學校系統，這樣的討論離青少年的生活情境可能還有些距離。最後，近年來網路傳媒高度發展，使得青少年與外界的互動模式有了質與量的轉變，心理衛生專業如何在其中找到自殺預防的介入點，除了創意與決心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要進入青少年的情境脈絡中，了解他們的所作所想所感

2. Title: Growing young with HIV. The challenges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a generation of youth nosocomially infected from Romania

Author: Lazar, Florin

醫學的進展使得愛滋病(AIDS)不再被視為不治之症，愛滋病患者若能積極接受治療，常能獲得不錯的預後情況。與若干年前相比，愛滋病對患者生理層面的破壞性已降低許多，然而患者卻仍難逃脫社會對愛滋病的汙名、歧視，使其在社會系統中仍面臨諸多的限制挑戰。此篇文章透過整理回顧公部門的社會福利統計、職訓方案參與的統計資料和以社區調查研究，來探討愛滋青少年的社會參與及就業情形。文章指出愛滋青少年有很高的比例在領取現金形式的社會福利，且參與職業訓練方案的意願普遍較低，求職意願也不高。作者呼籲應再思與愛滋病有關的福利措施，在提供福利服務之時，也要避免是否阻礙/削減了愛滋青少年的社會參與/整合。

近年來，社會排除理論(social exclusion)引發對於社會政策的再思，其指出貧窮並非單指物質上的剝奪(material deprivation)，也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隔離。換言之，一個被社會排除的人，在社會上很難被安置定位(positioned)，很難為自己作主，很難自給自足，甚至成為被忽略無聲的隱形人。而社會排除的過程具動態性，是個不斷循環演進的過程，且涉入了複雜的共犯結構。此篇文章探討了愛滋青少年被社會排除的現象，如此提醒我們，立意甚好的社會福利政策有時可能反向的將弱勢族群推出社會，就像文中所提的愛滋青少年，在接受福利協助時，反而失去了社會參與的動能，與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理念背道而馳。關於愛滋病患的福利及照顧措施，台灣目前仍停留在醫療取向，仍著重在關照愛滋病患者的就醫權益及隱私權，且只見消極的減少歧視，但就業、就學、社會參與等積極性措施尚未被提及重視。不可否認的，愛滋病仍承載著高度的汙名，愛滋病患者的弱勢處境仍在，我國對於愛滋病患的照顧措施應更多被討論，在了解與滿足愛滋病患者的需求時，也別忘記社會整合這個更關鍵的目標，我認此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提醒。

撰稿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安東尼組長

場次：WS011

主題：Child protection

英國和瑞典的社工做比較 Jan Fook, School of Social Work, UK

在整個歐洲來說，各國對家庭跟孩子的福利的觀念大不同，在北歐是預防的若念，南歐是保護的觀念，英國偏保護觀而不做預防，因此對英國來說最好的方式是讓孩子找到一個家庭認養孩子，是英國解決家暴的一種方式。瑞典用英國的方式改良、簡化 bbic，以孩子為中心，孩子的需求為焦點，社工調查評估時要思考孩子需求、觀念，給孩子充分資訊知道過程及目的為何，例：有一社工自認已認為案主，但用 bbic 模式發現孩子有些事社工並不知道，但要看大環境的系統是否支持此模式，否則可能失敗，失敗的例子是英國。如何以孩子為中心去執行，要花很多時間，有一些指標跟 sop，但若施行的話過程繁雜，故瑞典簡化為三角形為主的模形，孩子中心，家庭、大環境、孩子發展需求為三大塊。

撰稿人：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蕭琮琦處長

場次：WS011

主題：Child protection

Infusing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 with social work values: Constructing “risk” in
empowering ways

(注入社工價值的兒童保護工作：建構風險於充權方法中)

Keddel, Emily (University of Otago, Sociology, New Zealand)

在兒保社會工作中，充權與社會控制這兩個衝突概念時常被討論。從微觀的層次來看，要達到社會工作價值所謂的充權與合作關係，社會問題和兒保的社會控制功能形成最根本的阻礙。

在風險社會的概念下(新自由主義政策、個人可能遭遇之風險、和為因應風險而形成的規範)，社會工作方法為了規避風險也轉變為被動、並且不積極作為的方式。此次研討會主要論述一項社會工作判斷案例，訪談社工人員和案主，請他們分享在判斷過程中對風險和安全議題的看法。

這個研究結果呈現社工員運用他們的專業能力，規避了風險，但也發揮了創意以提升案主的充權。收養服務時常伴隨安全議題和尊重人性的道德議題之討論，研究中的機構和其社工員，跳脫出傳統及保守的觀念，傳統保守的模式包括將規避風險的焦點只放在建築安全、服務透明化、和單純的合作關係。他們抱持改革的信念，包括機構與案家合作、家庭培力和家庭安全維護、以及建立彼此信賴的工作模式。

這樣革新的工作模式，可以使照顧的核心價值和社會控制相互抗衡，機構仍然保持一定的控制力，與案主的關係也可以維持。

撰稿人：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蕭琮琦處長

場次：WS011

主題：Child protection

Making children's voice heard (讓兒童的聲音被聽見)

Westerdahl, Gunilla; Thorn, Mikael

(The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 Stockholm, Sweden)

在機構安置和寄養系統內的兒童少年是弱勢的一群，確保這些家外安置的兒少接受應得的照顧與保護是社會責任。為了加強保護機制，瑞典政府委任國立健康福利委員會督察所有兒童安置機構，並於 2010 年後，機構必須每兩年接受評鑑。

政府要求委員會監督機構時，以兒童權利為中心，將兒童的意見反映至主管機關。兒童會被邀請與督察會面，並與其討論如何參與規劃自己的療育計畫過程。此外，委員會設置一份資源手冊，內容包含幫助兒童了解自己在安置體系中的權益、一支服務專線的號碼、和特別設置的電子郵件信箱。這本手冊由社福單位負責分發。目前這支服務專線被廣為使用(多數是 15-17 歲的少年)。

讓兒少參與評鑑過程以及手冊使用，被證明可有效解決問題。督察後的結果與其促成的改變，都正向幫助服務精進。兒童少年於會面時，通常很願意與督察討論自身的經驗，其經驗有利於評估機構的服務品質，並且也證實給予兒童表達的機會，將增進兒少對自己權益的意識。

針對在安置機構和寄養家庭中的兒少，此次發表將討論如何幫助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

撰稿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劉淑瓊老師

場次：WS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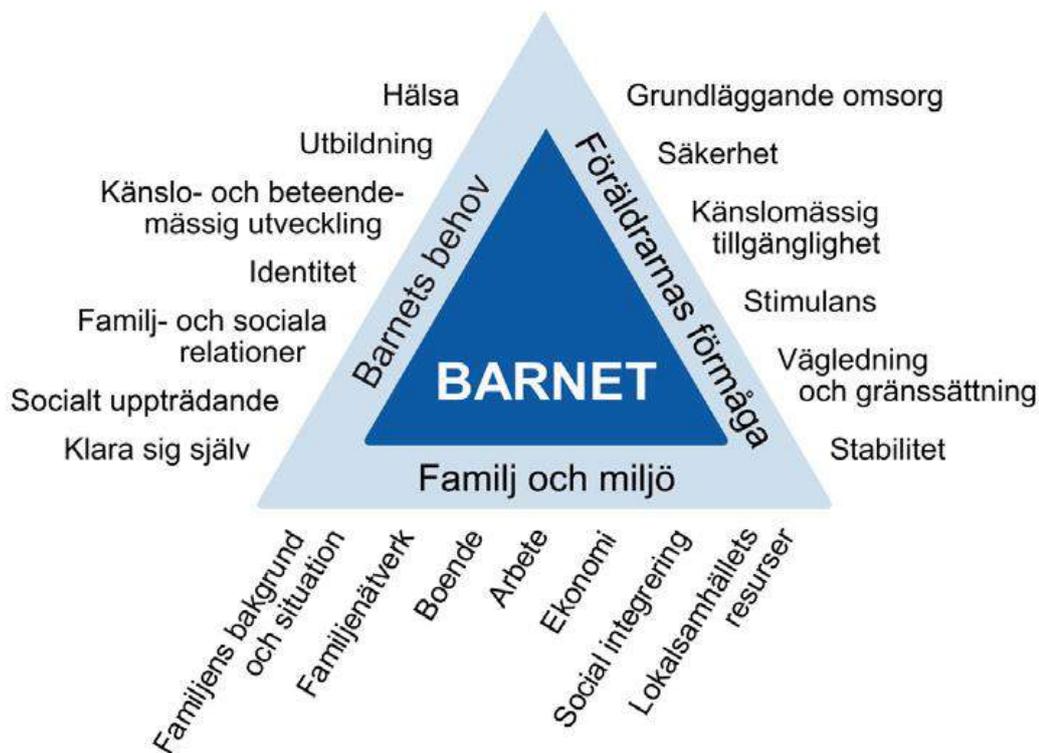
主題：歐洲的兒童風險評估觀點與經驗

(一) BBIC—以兒童需求為中心、平等齊—

來自瑞典的 Katarina Munier 以” BBIC---A safer Way to Protect and Support”為題介紹瑞典經過實驗與評估，於 2006 年正式採用的制度。BBIC 是瑞典文的縮寫，英文意譯為”children’s needs in focus”，是由瑞典國家健康與福利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 NBHW) 與 7 個地方政府歷時七年(1999 年~2005 年)，所共同研發出來的一個在英文體系基礎上¹，所做的全方位發展方案。

本方案主要是回應來自研究者、輿論及監察機關長年對兒童福利體系一再提出的批評。BBIC 在生態體系理論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與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 的支撐下，發展出“BBIC triangle”—從 1. 兒童的發展需求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needs)：健康、教育、情緒發展、認同、家庭與社會關係、自我照顧技巧；2. 親職的能力 (parenting capacity)：基本照顧、確保安全、溫暖的氛圍、社會刺激、穩定等；3. 家庭與環境的因素 (famil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家庭史與功能發揮、住宅、就業、所得、家庭社會整合、社區資源等三方面，體現以兒童為中心，發展與兒童、家長及不同機構合作關係的基本原則，也開展出兒童的蒐集與分析兒童全方位資訊的概念架構 (如圖一)。

¹ BBIC 的操作性任務是在瑞典的環境中，測試和適應英語整合性兒童體系 (English Integrated Children’s System, ICS)。



BBIC 的整體願景和目的是「被社會服務體系介入的兒童，應該像一般兒童一樣，被確保生命中機會的品質(qualities of opportunities in life)」。為達成這個願景的具體實施策略是在兒童福利體系中發展一個落實兒童保護的全國一致化體系(uniform system)，由下而上，由 NBHW 來協調；激發在地改善兒童福利的動力；整個組織投入，允許因地制宜、發展各地特色；組織可永續的學習與發展結構，並與方案執行同步進行評估。它是一個評估、規劃與檢視兒童福利的架構，有系統地蒐集資訊和記錄兒少服務需求。該系統包括可供社工使用的記錄，顯示可以如何將從第一次接觸到結案之間蒐集到的所有資訊，以一種有結構的方式記載下來。BBIC 的另一個任務面向在於，從 BBIC 的記錄中發展「基礎統計」(“basic statistics”)，好讓在地的後續追蹤輔導服務可以執行得更具系統性。這些都要靠和各地區緊密的合作才得以完成。BBIC 在操作面，強調參與、資訊、記錄及「實證為本」，組織一個包括方案管理者、訓練人員、資訊人員、IT 專家與研究者的堅強執行團隊，由 NBHW 在各種標竿團體、訓練者團體、記錄團體、IT 團體及使用者團體中擔任協調者的角色。

一項針對每天使用 BBIC 的 20 位社工所做的研究指出，BBIC 做為一個工具，對社會工作專業的貢獻在於，提供第一線兒保社工進行評估時一個透明的機制

(transparency)與結構(structure)，創造兒童及其家庭參與和合作的機會，開啟對話，有助於社工的分析和策略選擇。Katarina Munier 在結語時歸納瑞典經驗成功的要件如下：1. 啟動此一機制的時機；2. 運用者的知識、意願(will)與能量(capacity)；3. 在一個永久性組織內，方案團隊在方案中的地位 and 掌控；4. 要有永續性和責信。

(二) 兒保風險評估—隱性知識

挪威博士生 Haug Veronica 發表“Risk Assessment in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論文，該文的目的是在探討社會工作者在評估兒童的風險時，心裡在想什麼。她們如何將本身的專業技巧與知識、社會工作價值基礎、指引及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運用到兒童的危險評估之上？本研究所採取焦點團體、訪談、兒保記錄的文本分析等質化研究方法，以深入了解在挪威的兒童保護服務中，「風險」這個概念，如何在社工每一天的專業實務工作中被建構？

Ms. Veronica 首先破題指出，「風險」，不算是新的概念，然近年風險的建構被相當程度改變—它在現代社會中被發展成一個社會建構，相對於早期無法怨天尤人的大自然的破壞與災難，更關注於發生風險的機率，以及人們採取行動去降低風險的責任。運用到兒童保護工作中，「風險」觀點成為晚近社會工作的一個趨勢—在兒童保護實務工作中，從過去建立在所謂「專業判斷」上，個別化、心證化、缺乏結構的決策，遞變成一個在全球廣泛被使用的、已經高度標準化的臨床風險評估工具(tools or instruments)。

對此，Ms. Veronica 從懷疑論的角度提出：「我們真的掌握了『風險是什麼』、『如何辨識出風險』、『如何介入以降低或消除風險』的知識嗎？」的反思，頗具批判力道。她歸納晚近有關「風險」的理論論述可大分為兩大脈絡：1. 現實取向 (realist perspective)：是討論風險的主要觀點。Lupton(1999)將「風險」界定為發生一個危險或傷害的機率之產物。這一觀點包含了有關風險本質、如何計算、針對潛在的危機如何去行動和干預的知識。2. 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ism)：強調社會與文化的脈絡，可再分為以下幾個次分類：(1) 文化/象徵觀點；(2) 風險社會觀點；(3) 治理理論 (governmentality theorists)。

現代福利國家被期待在服務需求成長的同時，提供有效能的服務，善於管理有限的資源，以達到國家的，以及政治的目的。這使得兒童保護服務經常透過

可辨識和處理風險的標準化的方式與工具，以確保服務輸送與品質。Ms. Veronica 統整出以下幾項主要的批評：1. 有研究者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對風險的客觀與可測量」。2. 我們不確知有什麼潛在的行為是有害的，我們也不確知怎麼才可以避免危險的發生。3. 真正讓兒童處在危害當中的，是那些會受到社會論述所左右的因子，而不是這些標準化工具所標榜的「可測試的精準自然科學」。4. 風險的觀點比較是聚焦在為更廣大的人們降低風險，而不是真正地協助確實有需要的家庭和兒童。5. 標準化的工具和方法很可能不是幫助和保護家庭，而是讓家庭更加邊緣化。

Ms. Veronica 也對風險觀點在社會工作中的運用提出以下挑戰，她對被篩出來的「風險因子」，提出以下的質疑：

- 是社區導向的嗎？
- 是文化敏感的嗎？
- 能夠增加家庭與兒童權能的嗎？
- 有考慮兒童與家庭所在的脈絡的嗎？
- 可以降低社會不平等的嗎？
- 風險評估的方法，會從脈絡和結構的角度去看待社會問題嗎？若否，那使用風險評估的社會工作者如何能以更具文化敏感度與社會觀點，去保護兒童的權益呢？

（三）醫院社工的兒保風險評估—在多學科的場域

來自瑞典的醫務社工 Veronica Svard 以“Hospital Social Workers Assessment Process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Inter-professional Workplaces”為題，探究為什麼醫院裡不同專長的工作人員，對同一高風險兒童個案（children at risk）會有迥異的回應？其結果為何？在醫院環境中，什麼樣的規範在左右醫院社工的評估過程？在高風險兒童問題上，醫院社工如何建構本身的專業角色與界限，以區隔於其他專業人員？本研究以專業主義觀點（professionalism perspective）為理論架構，透過訪談 8 個兒童醫院裡的 14 位醫療社工，試圖了解醫院社工如何描述他們在多專業團隊中，對高風險兒童的評估過程。

Ms. Svard 從影響評估過程之行動的制度化的規範（institutionalized norms of action）切入，將論述的焦點集中在「通報態度」。她將通報態度依其主動程度，大分為三類：1. 主動型（active position）：經常通報給社會服務部門；2. 反思型

(reflective position)：若是案家沒有自發地解決問題，就通報給社會服務；3. 被動型 (passive position)：若非事證確鑿，不通報給社會服務部門。這三種態度與通報者對社會服務部門的認識和信心有著相當的關係，據此，作者發展出三種規範模型：法律的規範 (Juridical norm)、治療的規範 (Therapeutic norm)、醫療的規範 (Medical norm)。這三類規範模型對社工來說，法律的規範是以一種更廣泛的傳統意念推銷社會工作；治療的規範強化醫院社會工作領域對話的專長；醫療的規範則可能將醫療社工縮減到只是協助的角色。Ms. Svard 認為社會工作者以哪一種規範回應，反映了醫療社會工作該如何在高風險兒童的評估程序中做出最大貢獻的問題。這三類規範模型對兒童來說，採取法律的規範，意味著所有的家庭都被平等地對待，換言之，「無辜」的家庭，也有可能被放到惱人的調查程序中。採取醫療的規範代表高風險的兒童有可能未被注意並通報；採治療的規範，可能意味著關注到高風險兒童的醫院社工反映如何行動，以及提供一些支持或處遇。Ms. Svard 歸結指出，也必要了解制度性的規範如何影響評估過程，但不論採用何種規範，都要確定沒有對兒童造成負面的結果。

撰稿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戴世政博士候選人

場次：WS 020

主題：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WS020:1 The links between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how to move away from blaming mothers?

Morgado, Rosana (Brazil)

WS020:2 Confront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A case study from the outskirts of Brasilia, Brazil

Telles Kahn Stephan, Isabella (Brazil)

WS020:3 Professionalism or ageism? Social worker approaches to children expos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riksson, Maria (Sweden)

WS020:5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who corporally punish their children

Breshears, Elizabeth (United States); Sorge, Andrew (United States)

WS020:7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nd the public policies – the situation of families attended to at a unit of health in Goiania/GO/Brazil

Andrade Neves, Denise Carmen (Brazil)

原訂下列 3 篇口頭發表取消：

WS020:4 Risk factors for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 in family context and colletive

Caio, Vânia Maria (Brazil)

WS020:6 Domestic violence and homeless 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ashapu, Dharma Reddy (India); Ramanathan, Chathapuram (United States)

WS020:8 The behavioural problems of children who expose to domestic violence: a study at Ibbawatte area, Colombo-15, Sri Lanka

Rajasingham, Aruthra (Sri Lanka)

發表內容摘要：

此場次雖主題為兒童虐待，但討論的焦點擴及受暴婦女、施虐家長及兒童少年與社工的互動，其中有 3 篇發表文章來自巴西，1 篇來自美國，還有一篇來自瑞典，可以看出他們所討論的議題有高度的差異，在巴西的工作者仍然積極倡議應該要給女性及兒童更多保護的同時，美國的文章已經更進一步關注到服務系統中的次級案主群——可能童年遭受到不當管教的父母親，瑞典的文章則是更深入而結構性的討論到在機構內的兒童少年受到專業社會工作者所持保護或參與等不同服務觀點的影響，各篇的重點摘記如下：

WS020:1 分析巴西和英國在家庭暴力含括兒童虐待政策上的差異，作者採用系統

性的文獻回顧來討論在巴西女性所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特別是以歷史的統計數據顯示出在每年被殺害的巴西女性中有 40% 是 18-30 歲的初婚婦女，作者認為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似乎成了巴西的產物，相對於英國的法令和 policy 作為，巴西在婦女部分卻僅有性侵害防治法作為相關法源，因此，如何在保護兒童少年的前提下，同時保護到未被明文保障的受暴婦女，如何喚醒巴西社會對於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意識，是巴西社會工作領域未來重要的挑戰課題。

WS020:2 此篇報告主要在說明於巴西 2 市 1 鄉，為了降低兒童青少年受到虐待的影響，所進行的醫療體系向日葵計畫，作者提出當地的統計數據說明其在醫療系統所接觸到每年的受暴案件，其中性侵害 54 件、身體虐待 44 件、精神虐待 33 件、疏忽照顧 31 件，兒童少年佔受虐人口群的 39.2%，作者購過向日葵計畫倡議兒童少年的支持團體與更多的心理照顧，同時加強網絡成員像是醫生等人對於受暴案件的通報，這個計劃仍然持續進行中，作為一種方案的行動研究。

WS020:3 作者來自瑞典的烏佩薩拉大學，經由社工和 17 個安置機構兒童少年(包含 10 名男性, 7 名女性, 因目睹家庭暴力或遭受虐待而安置的兒童少年)的訪談，討論到一般社會工作者採用的專業主義觀點可能是協助、保護和否定兒童少年的想法與需求，因此兒童少年經常是被決定者，也可能因此受到影響而變得有機構化的傾向；作者另外分析兒童少年所期待的參與模式，包含了平等、照顧和夥伴關係，其中還可再細分是否與兒童少年談論暴力議題，而歸結出四種機構社會工作者的助人角色傾向，分別為：否定的成人、冷漠的成人、保護的成人和真正有幫助的成人。

WS020:5 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避免美國大眾偏頗地指責虐待兒童少年的家長，也就是孩子的父母親。在她的研究訪談中 27 個父母之中，有 25 個在童年都有被施以肉體上懲罰的經驗，這些施虐父母本身就是一個曾經的被害人，因此作者在進行 8 小時與這些父母的團體對話之後，建議日後對於施虐父母的處遇方向，應該避免落入現行高風險方案的思維，要有更多讓這些父母談論個人過往經驗的機會、看重這些父母和社區的關係、辦理支持而非教育性的團體、朝向發展尊重、施虐父母不被批判的方案。

WS020:7 作者說明在巴西的社會歷史、經濟和文化架構下家庭暴力的定義，包含兒童少年遭受虐待，並指出 1990 年巴西通過兒童少年法來保障兒少人權，但經過其所屬單位於 2005-2010 年間進行調查發現：有 60% 的人未曾聽聞過相關兒童少年服務，87% 的受訪者也指出兒童少年服務在公眾教育上的不足，作者歸結在巴西每天都有家庭暴力案件的產生，但卻缺乏相關具體公共政策執行面的配合，且整個社會文化有責備問題家庭的傾向。

撰稿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高安遠研究生

場次：WS030

主題：Stud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本場次是針對各國的弱勢群體所作之相關調查與研究，發表者有來自泰國、印度、日本、伊朗、芬蘭與台灣等國家的學者，各國的學者針對不同的群體所之研究相當多元且豐富，有泰國的學者針對低收入者的微型財政進行行動研究，也提出了社區型的微型財政組織的建議、而印度學者則研究在強制都市更新與發展下對居民的財富、生理與心理影響，指出發展和改善公共建設不只是純粹的技術問題，更是廣泛的牽涉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日本老人單位的 NPO 組織也做出農村老人預防癡呆症的相關因素性質研究、而芬蘭學者研究的方向是國際間的弱勢青年與社會工作干預在主流社會政策下的探討，針對不同類型的國家，如語言、國家發展的程度，對弱勢青少年的政策有很大的差異，另外日本學者也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特別是針對印度和日本做了研究，在企業中使用的決策與參與方式影響著該國與全球的市場。而台灣發表的文章是針對現金弱勢青年的就業現況，以及政府與非政府對弱勢青年的就業模式作探討。

這個場次的議題很廣，雖然鎖定是弱勢族群，但各國家的研究者著重於弱勢族群的不同層面，從上到下有社會政策到個體因素，有主流政策去探討弱勢者的位置，也有從公共政策造成的影響作出發點；從橫向的單位來看，從公部門、NPO 甚至是社會企業，都是各國學者探討的重點，此場會議所探討的議題與領

此場次台灣發表的內容是探討目前弱勢青少年工作由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支持類型，研究指出，青年的弱勢就業機會需要被支持，使當前的勞動市場能夠取得合適的工作條件與機會。

撰稿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黃建智研究生

場次：WS030

主題：Stud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本場次討論主題為社會中弱勢群體之研究報告，根據當天會議討論的子題內容顯示，近年來人口老化、青年失業等社會現象不僅對台灣社會造成影響，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下，貧富差距和失衡的人口比例，會是未來社會工作的重大挑戰與問題。在此場次的發表演說中，對於日本提出一篇關於影響參與預防失智症團體方案的文章，相當有感觸與體會，所以以下針對【A qualitative study of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continuation of group activities for dementia in rural Japan】這篇文章，做簡要的摘要與討論：

這是一篇敘述影響參與預防失智症團體因素的質性研究報告，發表學者一開始指出：少子化和人口高齡化已經對日本造成相當嚴重的衝擊，而未來這樣的社會現象，影響層面將導致整體社會福利體系的資源分配變動，勢必對於各國都是極重要的議題，而日本政府目前正積極地為老年人口居高不下的社會現象，做出正面的回應與安排，其中，「失智症」是所有老年人所懼怕的病症之一，因為當家中有親屬罹患失智症，對於家庭照顧會產生嚴重的依賴，且可能對於患者本身的身心造成負面影響。

在這樣的前提下，日本政府近年來在預防失智症投入相當大的心血，除了醫療上的研究發明，另一方面更配合當地政府與社福單位，以及非營利機構組織成立預防失智症的團體方案，在 2000 年由 Tokyo Metropolitan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MIG) 辦理一系列的預防失智症團體方案，參與者在方案中學習烹飪、運動以及如何預防失智的生活能力技巧訓練，依照參與者的需求，方案的時間會有不同，同時在民間的非營利組織單位 The Support Center for Dementia Prevention (SCDP) 一樣在為預防失智症的議題舉辦團體活動，而類似預防失智症的團體方案，受到日本居民的喜愛，這些團體數目達到 300 個之多，即使政府與民間對於方案給予好評，但令人不解的是，依舊有部分參與者，無法或是沒有意願，完整參與整個預防失智症的團體方案，這也是研究者想要探究的問題，瞭解影響參與失智症團體成員的因素。

研究報告顯示：即使方案活動內容深受參與者喜愛，但影響參與者是否持續在方案中行動，其最大的關鍵因素在於：**團體凝聚力是否存在**。透過研究者的質性訪談過程發現，團體成員的互動過程，若成員彼此間願意分享屬於個人的經驗或過去的故事，比起單就預防失智症的討論分享，更有機會建立起團體成員的信賴感，部分團體成員甚至覺得，若單一就預防失智症的活動而言，對於他們的幫助是有限

的，他們需要可以聊天互動的情感交流。

研究者指出，回歸到在日本的文化背景脈絡下，也許能夠理解影響參與失智症團體的因素在於：在團體方案的互動過程，日本人不僅希望能分享個人在團體中獲得的經驗（例如：失智症的預防過程、團體中的活動內容等等），需要更多機會可以分享私領域的想法（例如：社區的新聞、八卦軼聞），而建立更深厚的團體凝聚力，影響參與者願意繼續參與團體的動機。

此篇研究報告主要貢獻為，對於往後在設計相關方案規劃與團體活動，如何與文化脈絡相關的議題做結合，設計有效益的團體方案，是個相當重要的議題。也提醒團體互動過程，必須仰賴參與者對於彼此的信賴感，未來若有機會參與功能性團體的帶領，值得去深思探討，在團體目的之外，提醒如何運用情感連結，讓參與者能在目的功能下，也獲得情感上的支持與滿足。

礙於時間限制，當天無法深入與發表人互動討論，深感可惜，但仍在此提出兩點疑問，第一：研究者特別強調此現象在於日本的鄉村地區，而不知道是否地域性因素，會有不同的影響因素，例如：都會區與鄉村的參與者需求間有何不同，參與者需要私領域的互動，是否僅限於在鄉村地區，無法在報告中詳細知道結果；第二：方案的參與時間，大多是一週一次，連續5週到26週（兩年兩個月的時間），時間上的差異頗大，而這樣對於活動安排的影響為何，是否有既定的課程和學習內容，都值得分享與了解。針對此篇研究報告與內容，若能再深入了解與探討，相信對於目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台灣，會是個重要且寶貴的資訊。

撰稿人：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任麗華老師

場次：WS035:1

主題：瑞典新方法顯示身障人士的居住環境條件

報告人：Flyckt, Karin(瑞典國家健康與福利會委員)

序論

瑞典憲章中關於身障人士的兩大保障目標，是社會參與及公平居住環境條件。根據憲法，執政黨須蒐集適合的資訊，包括統計和研究資料來幫助國會議員組成並完成憲章的使命。但是，當探究身障人士的居住環境條件時，一些問題仍然產生，在全國性的調查中，顯示身障人士是有困難的，在過去幾年，瑞典國家健康與福利委員會發展了一套新的方法來了解身障人士的社會參與及居住條件。

方法

根據國家主計處所登錄的健康、收入、就業、教育及社會支持系統，國家健康與福利委員會進行了幾次關於身障人士的居住條件研究，這些研究對象是以有功能損傷並且接受支持及服務的身障者為對象。

目標

以增進身障人士對社會參與及居住環境條件的知識為主。

成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實驗組(身障人士)及對照組(一般人士)間有明顯的居住條件的差異。在所有的調查項目中，除了房屋標準外，實驗組的身障人士比一般人士的居住條件還差。身障人士常只有低學歷、被勞動市場排除，在社經地位上處於弱勢的特性。身障人士在家庭的定位上也較一般人士弱勢，例如較少的身障人士結婚或擁有小孩。

結論

在瑞典的社會中，身障人口不斷攀升，而且有些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明顯的是，比起一般人士，這些身障人士處於經濟弱勢且缺乏工作機會。瑞典政府現正積極的朝向改善身障人士的經濟狀況及社會參與的目標進行。本研究會繼續探討上述瑞典健康與福利委員會位身障者所面對的居住環境條件。

撰稿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秦燕老師

場次：WS045

主題：社會工作教育(二)

社會工作教育(二)，有五篇現場發表者，有來自日本東京、加拿大、英國、斯里蘭卡及台灣，我和研究生張允閱報告台灣社會工作倫理課程教授的現況和未來展望；日本學者報告的是社會工作核心課程標準的調查報告；加拿大學者報告加拿大高等教育受新管理主義影響下的社會工作進展現況；英國學者報告“服務使用者和雇主參與社會工作學生教育訓練的持續發展”；斯里蘭卡學者報告“將社會工作教育納入社會發展——以斯里蘭卡一個漁業社區的婦女與其中辍子女的發展方案為例”。斯里蘭卡的準備最豐富，除了PPT報告外，還有彩色的書面手冊給聽眾，可見他們對此次研討會的重視。報告之後的討論，很多在討論英國提出教育預算大幅刪減，對學生的實務訓練頗有影響，加拿大新管理主義下，大學社工系所重研究發表，輕忽教學及實務結合，是社工界看到目前令人憂心的趨勢，大家也彼此互勉！

撰稿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安東尼組長

主題：WS057

場次：Violence – empowerment of women

英國學者 Shula Ramon Empower Women and Providers: A comparative project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mental health.

家暴跟心理健康的關係，聯盟有個計畫，在英國、希臘、伯來都有實行，如何培育女性從受暴者克服心理障礙而自立自強，成功的例子自己成為小組的主持人，遊說方面對家暴覺醒的功能。此方案對復元有新定義，生活價值提升，有小組的支持，有對付的策略，碰到問題如何應付，就業、人際網絡等，有全套的定義，比之前對復元的定義而廣，但受暴婦女有其他心理問題，有雙重標治，會花很多力氣去隱瞞、避免談論他們的問題。故家暴與心理問題常是在一起的，因最親的人傷你最深，對心理健康有嚴重影響，社工要取得個案信任，讓其知道不是他們的問題，他們是受害者。歐盟的計畫得到女性肯定，訪問幾個參與者也肯定此計畫，打算讓它繼續。

巴西 Patricia Grossi, Brazil,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School of Social Work: Women's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intrafamilial violence

每 24 秒有一受暴女性，政府花很多時間處理此問題。此研究訪問 11 位女性，8 位 ngo 工作者，發現一般警局對女性不友善、不諒解，被拒絕所以放棄，女性也會怪自己不好才會被打。現在在巴西有特別服務女性的派出所，對女性較友善的環境，以前的方式是打老婆的男人被罰小錢就沒事，所以女性需更多支持、社會大眾更多的認識，需要被安置、經濟獨立、empower。

瑞典大學 大學生 Sharlotte Tusasiirwe, Gothenburg University: unraveling men'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weden

訪問加害者支持中心，男性發現他們有暴力行為可以去諮詢中心，取得幫助，這些地方在瑞典幾個城市都有，瑞典應該是性平的國家，但事實上家暴是極不平等的問題，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目前有男性中心可以尋求幫助，男性如何描述其問題，及為何會去求助的研究。另一半要求要離開，所以男性會怕，或是原為口頭問題、互罵，突然動手，所以覺得自己太過份，所以求助，但去之後仍會保留，不會尚開心，而是策略性描述暴力行為，例：沒流很多血，是因她刺激我，我講不過她等藉口，或因他們覺得無力，像失業...因此自尊心受損，故雖尋求幫助，

但仍不承認犯錯。第一部讓他們承認錯誤，並對行為負責。對諮詢社工來說，要了解男性的話、男性的語言，因其會怪對方、會解釋行為、會保留，進而幫助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幫助其找到解決方法。

瑞典 國家健福局代表 Christian Ericson, Jenny Nybom,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 Swedish government

2007 年瑞典政府發起反女性暴力行動，訪問 353 位女性來到中途之家或醫院的急診中心，跟 206 位沒有到社福單位尋求幫助的女性做比較。2011 年研究結束，發現女性都受嚴重暴力，1 年後大部分女性在尋求幫助組還是繼續受暴，但很可惜未求助組無法做比較，因資料蒐集時也發現錯誤。兩組人在心理健康都有進步，很意外的尋求幫助者仍會受暴，分別有醫院的 64%、中途、安置中心 82% 仍繼續受暴。瑞典政府為幫助社工評估案主家暴問題，有簡單 12 問題讓她們形容自己的狀況，過去是否有受傷害...？有無家暴危險性？可以透過問題的答案來評估是否需安置或繼續留在家裡，包括 20 個問題詢問生命危險，被殺的可能性，下一步是 9 月份開始讓這工具被社工使用。對兒童的評估調查尚未實驗過，因有法律問題。雖這些評估工具很方便，也有助社工評估性命危險，但他們仍要相信直覺及對方說法，若有女性說她是高危險，還是要小心，相信她的感覺。

美國 研究在巴基斯坦 充權過程的研究 Filomena M. Critelli, University of Buffalo: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 experiences of women seeking domestic violence services in Pakistan

充權的定義各國約有三十多種定義，用 2011 年的定義：擴展人的策略決策能力，讓其有充分資源能發揮以前無法發揮的能力。如何去量化充權呢？也是各國不同文化定義都不同。例：巴基斯坦能自由離開家自由走是一個權利，但在他國可能很平常，或有權利決定要嫁誰。此研究訪問 19 位，從 2007-2009，在安置中心訪問。女性的情況很糟，有的已試圖自殺 2 次。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林珍珍老師

場次：WS060

主題：Disaster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1. 日本大地震後的短期安置問題

在日本海嘯之後，許多人面臨短期安置後社會隔離的孤獨狀態，因而導致在安置中的死亡。在此研究稱為 isolated deaths。由於沒有親友的接觸，而造成安置期間死亡率的提高。因此這個研究著重於安置期間的人際網絡的建立。根據研究，安置在大空間的居住地，被安置的居民較有互動的機會，是促成減低死亡率的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是在安置的社區，居民之間組成各種組織協會，也是促進互動的方式。第三個方向是志願者的參與，可以與居民增進互動機會。最後強調社會隔離的問題在安置中經常發生，安置社區中的網絡必須可以聯結起人與人之間的有意義連帶，才能減少因社會隔離而造成的死亡。

2. 加拿大氣候變遷的社區調適

由於全球氣候的變遷，造成許多災難，如颶風和森林大火以及水災，生態的改變也讓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的甲蟲異常繁殖。因此在面臨氣候問題，對應此問題的不僅是易受害的城市和當地主責機關，也是教育者 健康專家 社區成員，公部門和私部門的管理者，以及學術社群都應共同重視的。特別是針對氣候變遷 災難和永續發展之間的關係，以上工作者要做持續的探討。在目前研究由於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男性和女性對困難嚴重性的評估方式不同，而延遲了大眾對這項問題的重視。

3. 台灣莫拉克風災的文化問題

台灣莫拉克風災由於受害者多為原住民，使得重建工作在文化議題上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焦點。在小林村的重建社區，以大愛村和小林二村為例，呈現不同的重建思考邏輯，其背後包含著主流社會的多數決民主原則及資本主社會的大量生產 雇佣關係以及個人自由選擇原則。相對應於原住民文化的集體性和共識決原則，形成社區建構的原則衝突，是未來重建的工作的重要挑戰。

撰稿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劉淑瓊老師

場次： WS068

主題：紐澳的兒童風險評估觀點與經驗

Susan Young 等分別來自澳洲、紐西蘭及挪威的作者，以“Child’s Rights/Community Development Principles: Key elements for Child Protection Practice”為題提出口頭報告。過去北歐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將不同國家的兒保社工有相當類似的兒童風險評估，歸因於它們的「福利與兒童福利模型」相當近似。本文複製同樣的研究思維，運用到不同邏輯的國家，像義大利，以檢測假設一國家的脈絡（national context）在社工評估兒童風險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採質量並用，共計回收 61 份問卷，也進行焦點團體。

研究結果發現：（一）儘管這些國家的福利與兒童福利系統不盡相同，但社工實務的專業取向（professional approache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卻很近似，尤其是當兒童或嬰兒命在旦夕，亟待保護時。（二）評估青年的脫序行為（acting-out behavior）則較為困難，在回答開放式問題上出現明顯差異，不只是不同國家之將不同，即便是在同一個社會福利單位裡的不同社工之間，也很不一樣。對於這個結果，Susan Young 等人做出以下的詮釋：（一）兩個不同的體系社工出現相近似評估，或許是因為「兒童保護」在大多數的國家都屬於公權力介入的範圍，在各福利體系中也都是一個服務和介入的核心領域，而且是建立在「兒童權益」此一普世的價值之上。（二）相當程度反映了歐洲社會工作教育的趨同性。

至於不同的體系對於介入程度（degree of interventionism）有不同的評估和主張，Susan Young 等人認為這和以下幾個因素有關：（一）兒童福利體系互異—北歐國家強調預防性與家庭服務取向，義大利則只聚焦在兒童保護。（二）地方層級的兒童福利體系之組織（法令的角色）不同。（三）各體系資源豐枯、可得服務的數量與型態有所差異。（四）對社會問題的詮釋存在文化差異。

來自紐西蘭的 Emily Keddle 發表“Infusing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 with Social Work Values: Constructing ‘risk’ in empowering ways”，從「風險」的角度，探討「增加權能」、「參與」、「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這三個晚近在兒童保護

領域，甚至整個社工界被當做「顯學」的概念，在兒保實務中的真實面貌，以及社會工作者如何善處暗藏其中的緊張關係。Emily Keddle 認為在人類社會中，「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不確定的，也是權變的，人活著，或多或少就要跟風險共生並存。但是，做為一個專業社工，我們要意識到「探討『風險』本身，就存在著風險」(the risks of “risk”)。首先，人們往往從個人化 (individualized) 的角度去建構個案的問題，像是：責難、懲罰、將加害人或兒童移出家庭、不太關注關係的修復(restoration)，或是孩子的真正需求。其次，有鑑於風險的普遍存在性，人們關注的是如何將各種風險加以數量化和規約的能力，影響所及，社會工作者無形中變成了技術官僚 (technocrats)。第三，存在倫理中立化 (neutralization of ethics) 的問題。Emily Keddle 據以提出反省：社會工作實務是不是因此就要無望地步向複製這些主流論述的宿命？是不是就要走向反動的、風險反轉 (risk averse)、防衛的、責難的、科技官僚的、家長作風的 (paternalistic)、個人主義的，以及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抱負 (neo-liberal political aspirations) 相呼應地運作？

Emily Keddle 進一步分析，「增加權能」、「參與」、「協同合作」這些在社工界看似「殆無疑義」的概念，事實上還有商榷的餘地。以「參與」為例，常被當做是一件毫無疑問的好事，但實務工作上，以兒保涉及施展公權力的現實來看，這樣的理想知易行難。相反地，大多數的兒保實務比較傾向家長作風，這些論述顯然並沒有和兒童保護工作所連結的期待相契合。那社會工作者是如何來處理這些緊張的呢？Ms. Keddle 以質化研究方式，訪談 22 位工，以及 13 位適當的利益關係人 (父母、年輕人、寄養照顧者)，和大型 NGO 的代表。結果發現，社工對於負面力量，顯示出比先前所描述的更加複雜的反應—而且有很多以成功地自我界定為「令人滿意的個案」(“pleasing cases”)的方式，來執行增加權能。服務對象一般來說支持這種做法，儘管他們對於「風險」和增加權能的評估有不同的觀點。實務上，面對這種情境，社會工作者採用以下幾種方法因應：

- 使用「尊重」概念，去劃定個案生活領域的界限 (那些容易造成social control的)。也就是，將那些特別地、被嚴格界定為對兒童有害的框出來，排除在外
- 用個案能懂的語言溝通 (對成人與兒童)
- 用一個長程的觀點來看待兒童的福祉，並釐清兒童的想法
- 避免反應性 (reactivity) —協助降低實務工作中的緊張
- 將促進關係的維繫當作是管理風險的方法之一：對誠實與可信賴具有很

強的承諾

- 運用安全評估與安全規劃工具
- 整合在地與全球模式
- 運用像 Signs of Safety (SoS)²這類以安全導向評估工具

² SoS 提供了一個蒐集詳盡資訊的格式，並「改變焦點」(“changing the focus”)—從「試著從過去的虐待行為去評估風險」移轉到「該做些什麼以確保未來的安全」。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林桂碧老師

場次：WS 077

主題：Global agenda 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1.Global agenda 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voices from South Asian social work. (Nepal)
- 2.Enhancing employability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of the unemployed people. (Latvia, Czech Republic)
- 3.Economic security as an aspe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for northern indigenous peoples : opportunities,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Canada)

此場次原有 7 篇報告，但到場只有前述 3 篇。主要內容分別是：一、探討南亞地區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歷史和社會發展，該地區的社工員會強烈尋找其國家、社會所認同的專業服務，因此在南亞地區的專業社工員都非常的積極，亦希望透過社會工作學術分析和考證對全球社會工作有所貢獻。二、透過資本建立，加強失業者的就業能力，因為失業的主要理論概念是 employability gap，換言之，對勞動市場而言最重要的是 employability，因此作者以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觀點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主要對象是失业者和初次尋職的年輕人。三、研究加拿大原住民社區的經濟發展，希望透過工作解決貧窮、促進繁榮及改善個人與社區的福利。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林桂碧老師

場次：WS 096

主題：Social enterpris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1. Fishing from opposite banks-same river, different fish? Ca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bring service users and practitioners together. (United Kingdom)
2. Underdeveloped communities in Croatia : Synergy of unfavor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roatia)

此場次原有 8 篇報告，但到場只有前述 2 篇。主要內容分別是：一、這是一個行動研究的報告，係由大學社工系與一個位在受到社會和經濟剝削沿海渡口的社區發展機構合作，是一種知識轉移合作社（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 簡稱 KTP）的形式，屬於英國政府基金方案，係支持企業使用學術知識和專門技術。並透過合作生產，調和其差異和衝突的價值觀，建立永續的社會經濟，所以永續的社會發展是建立在所有權的分享與貢獻。二、探討 Croatia 有三種不利於發展的社區，一是直接受到戰爭、反對計畫經濟和社會原則影響很明顯，二是因 20 世紀移民潮產生的社區潛藏著未發展的結構，三是從社會主義轉到資本主義而不適應的社區，這三種社區重要的社會和經濟結構都受到擾亂，導致生活品質很低。

撰稿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安東尼組長

場次：WS110

主題：Violence against women – Case studies

孟加拉 Jannatul Fardosh,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Studies, Bangladesh –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urban Bangladesh

孟加拉家暴情形，家暴是任何形式的虐待，包括肢體、精神、性都算，在孟加拉政治方面女性權力很重視，但家暴問題仍不斷增加，研究透過訪問及其他研究方法發現，家暴原因 1 社會地位，從上一代價值觀或過去經驗，男性主義觀念、外遇問題、嫁妝問題、破產、強迫成為性工作者...等，在中度社會的層級裡發現也有上述原因，但另外她們跟娘家的聯結也是家暴的因素，其他因素跟低層家庭差不多。在最高層家庭裡，外遇是最大問題，或是價值觀差距、婆媳不諒解、無充分溝通等原因。普遍性的問題是大男人主義、溝通問題、嫁妝問題。為何女性會忍受暴力？在低層社會因為本來程度就低，跟文化、宗教觀、娘家的經濟問題等有關；中等家庭是考慮孩子未來，跟文化、宗教、婚姻觀、社會地位有關；高層的人是因為孩子、文化、宗教、男性社會。但現在孟加拉也在改變，2001 年在首都一年就有二千人離婚，現在高達九千人。

斯里蘭卡 T. T. Mayuran, Sri Lanka, consultant, consortium of humanitarian agencies, chairman, centre for children's happiness –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st-war era in Northern Sri Lanka

研究戰後在北斯里蘭卡女性暴力問題，1983 年 7 月 23 號開始，8-10 萬人在內戰中喪命，女性在戰亂受害最嚴重，無論身、心都非常普遍。另外，海嘯也是一大災難。質化訪問 6 位女性，有 6 個焦團。雖然暴力在戰前也有，但戰爭中會讓女性更弱勢，2009 年戰爭結束有 3000 戰士回到社區，要面對失業及教育問題，寡婦也增加，北部有 10%，從三萬到三十萬。有性別不平等待遇，社會階層的問題也是，特別是針對女性，在北部每月有 5 位女性自殺，2001 年的 10 個月內有 346 位青少年懷孕案，女性人口只有 30 萬而已，30 萬當中有 3 萬是寡婦，也有心理問題。需要幫助、社工協助，包括充權、自我幫助小組，讓她們能接觸到資源，社會大眾覺醒，社會價值觀、教育、政府決策都需改善。

退休政府官員，現任 Mauritius 政府顧問女性暴力問題 Kishore Chandra RAMGOOLAM, Senior Adviser, SILW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 case of Mauritius

性別暴力在當地是很大的問題，真正情況尚不清楚，雖然當地有三個法律會保障女性權力，包括家暴防治法、性平法、性歧法，都符合 cedaw 標準。在政府組織內有家庭服務部的家庭防治中心、家庭服務部、家庭服務局，政府也會跟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合作。當地是小國，需跟鄰國合作，像南非聯盟、非盟等組織。他們有對男性的方案，叫男人是伙伴，有婚前諮詢，有婚後的幫助、加強、情緒管理。另有一防治家暴行動計畫，有一個顧家暴行動的計畫，評估家暴對國家的損失有 14 億盧幣。

羅馬尼亞 Ana-Maria Dumitrescu,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Faculty of Sociology,
Romania – Victimization of women in Arges County in the light of transition of
society after 1989 revolution

1989 年革命後，對女性狀況的研究，研究方法是訪問受暴女性的問卷調查，也去蒐集當地報紙、媒體，發現尤其在偏遠地區能夠幫助是很有限的，例：在某地區共有 60 萬人口，卻只有 1 個中途之家。這個問題是他們沒有選擇性的去引介西方觀念，在革命後就開始引進西歐觀念，但沒有做選擇、過濾，所以對她們的價值觀、原本的文化習慣都有偏差，讓這些亂七八糟觀念大量引進，反而讓社會大亂，這是引起家暴或其他問題。因此，建議女性需更多照顧，需要新的法律改革，需要增加中途之家，及社會大眾對家暴觀念的改變。

喬治亞安置中心主任 Ketevan Dadunasvil, Tbilisi, Georgia. Sakhli-Advice Center
for Women – Women, violence and forced displacement – Case of Georgia

安置中心從 1997 年開始，是全國第一個對女性的安置中心，至今已有二千多名女性及孩子受惠，其中有 800 位受到心諮服務。喬治亞公約已通過，亦有方法處理家暴、人口販運問題，但政府行動慢，政府官僚等問題讓受暴者未得到充分保護。另外，在安置中心根本沒地方讓她們住，數量太少，所以無法尋求幫忙。因此普遍來說 80% 女性認為受暴應留在家裡，40% 經驗過某程度家暴。結論：一般受暴女性不會想去解決問題，直到真的非常嚴重才会有行動，只有政府跟非政府組織整合才能建立社會福利架構。

撰稿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淑容老師

場次： WS112

主題： Marginalization of elderly and homelessness：「邊緣化的老年與遊民」

1. 韓國首爾大學 Joon Mo Kang 副教授報告”Social exclusion of the elderly in Korea”主要在探討韓國的所得移轉制度提供多少給付，以及在韓國有多少老人被排除在所得移轉制度。報告者指出韓國有三種與老人有關的所得維持制度：國民年金制度（the National Pension）、基本老年年金（the Basic old age pension），以及基本生活所得方案（the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program）。報告者在其研究發現雖然基本老年年金（the Basic old age pension）給付水準相當低，但仍約有 60% 的老人領取基本老年年金；相較之下，基本生活安全方案(the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program) 對老人給付較為充足，但因申請門檻很高，普及率較低以致於影響有限。國民年金制度（the National Pension）則屬教育程度較高、且工作較為穩定者較有可能參與，故社會保險在提供老人經濟安全上扮演角色有限，特別是那些被排除在主要勞動市場之外的人。

2. Crossroad 主任 Arto Moksunen 所報告的”Crossroad: combating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among migrants in Stockholm”主要在介紹 Crossroad 這個於 2011 年 3 月 1 日成立的機構，該機構主要在於服務來自其他歐盟國家目前住在斯德哥爾摩瀕臨貧窮與無家可歸的人。隨著歐洲國家經濟不景氣與失業率的提高，許多歐盟國家的人民前來斯德哥爾摩尋求建築、交通及農業方面的工作。但如未能如願找到工作，被排除在瑞典的社會福利與健保制度之外，則很容易就會陷入窮困且成為無家可歸者。這個來自歐盟其他國家的無家可歸者，通常不在官方的統計數字中，但可能是斯德哥爾摩規模最大且成長最迅速的遊民團體。相較瑞典當地的遊民團體，這群歐盟遊民較少有精神疾病及藥酒癮濫用的盛行率，其主要的需求在於對瑞典社會及移民權益資訊的了解。Crossroad 其對這些遊民提供（1）基本需求的滿足：包括食物及衣物，（2）有關移民權益的資訊與建議：以該遊民熟悉的語言來提供，（3）協助其與政府機構與私人組織聯繫，以及（4）提供加強技能的活動（如語言課程）。據統計去年 3-12 月，Crossroad 平均每天有 50-90 個遊民來造訪，共服務了來自 78 個國家，約 1500 名的遊民。

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蔡海偉報告”A Study on the expenditure pattern of low expenditure households in Hong Kong in past 2 decades”
 蔡的研究以過去二十年低消費家戶的消費形態來測量香港貧窮家戶，特別是

獨居老人，如何因應家庭所需。他指出 1996 年一份相同的研究發現：(1) 低消費家戶將其很大的消費比率用在食物與住宅上；(2) 最低消費層級的家戶因為要負擔高房價，被迫將食物降到最低水平以下；(3) 住在私有住宅的貧窮家戶要比住在公有住宅的貧窮家戶在消費上更受剝奪，前者的房價負擔要比住在公有住宅者高出 40%~100%。蔡海偉指出此 1996 年研究使香港的住宅政策因此做出變革，縮短公有住宅的申請與等待時間。而蔡的這份研究則以香港政府人口統計局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與 2010 年香港家戶消費調查 (the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四次調查的結果來探討低消費家戶的消費組成及其趨勢。其研究發現香港貧窮家戶佔所有家戶的 17.8%，貧窮家戶獨居老人為了維持生活，常被迫要降低食物的支出。香港老人無老年保障制度，他們只有基本的津貼 (HK\$1090/月)，而沒有年金制度。而香港社會救助制度審查非常嚴格，且充滿烙印化。貧窮家戶獨居老人，常需子女簽署不提供老人經濟支持的文件，以換取老人獲得補助。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羅秀華老師

場次：WS115

主題：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社會工作教育與永續性)

評析國際社會工作啟動對學生、實習督導與大學教師的影響

文獻顯示，參與國際性相關活動的老師和學生，得以發展出更為綜觀的意識，以探悉地方與國際層級的案主和社區需求。自 2000 年以來，國際化的社會工作教育是猶他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使命一環。國際社會工作標的在於國際化社會工作課程，建構學生出國學習與實務體驗的機會，並增進跨國師資與學生與大學的服務與獎學金的交流與合作。達成這些標的的策略包括國際聚焦課程的發展，將國際化內涵帶入課程，促進學者參與國際化聚焦的比較研究、方案發展與專業組織的參與，國際客座學者的贊助，擴展國際學生的招生員額，提供學生出國實習、獨立研究與小組研讀的機會。而這些策略在滋長大學社區以發展全球社會福利課題、政策與方案環境的有效性如何？此研究乃藉由問卷調查來了解老師、學生與實習督導的意見。

全球非營利組織在孤兒照顧上的專業教育

研究者的全球性方案乃在於提供有品質且有研究基礎的孤兒照顧方法，並創造社會工作照顧者與其組織正向的專業認同。寄養家庭和育幼院負責照顧孤兒。而有七百萬的孤兒人口是有著社會、情緒和認知等的成長發展脫序風險的嬰幼兒。照顧者的預算有限、缺乏地方政治支持、工作人員的位階低，也沒甚麼管道接受專業的照顧教育和督導。而大多數的照顧者是沒機會接受教育的婦女，使得在地的專業認同與實踐面對諸多挑戰。

歐洲公平啟蒙網站方案：照顧者教育的真實生活檢驗標準 (Real Life Tested Standard for Caregiver Education)。研究者於 2008-10 年間啟動此一歐盟方案，與丹麥及丹麥國立社會與健康照顧學院合作。目的在於發展與檢視如何充權家外安置的地方照顧者的教育內涵。是由五個國家的育幼院主管和寄養家庭管理者形成這個學術網絡，來檢驗類此設計。方案結果是正向於尊重嬰幼兒發展，以及使用者的專業能力和認同的形成。方案成果之一是這個網站中使用八種語言提供免費

使用。此方案運用在工作場所，而有手冊和包括理論運用在實務的示範影片的 15 個線上課程。15 個自學課程指引參與者一些照顧基點：增進安全連結、理解不安全的連結、增進同儕關係、形成像家的團體、打破工作場所與地方文化的社會藩籬。參與者分享理論部分、自己是如何依地方文化和環境將理論應用在實務的設計者，因而創造專業認同和對話為基礎的組織。方案成果建議歐盟得有共通的照顧的專業教育準則。歐洲之外，也由印尼政府依此方案擇定 8000 個育幼院設有教育準則。2012-3 年在網站上也將有 16 種翻譯語言。

美國夏威夷大學保有社區優勢的鄉村地區遠距教學

因著工業革命而將眾多的鄉村人口吸引到都市地區生活。不僅將最好的學生送到都市接受教育和經濟機會，也出現理論上的「創造性階級」，都市之間彼此競爭最好的人才。這也加速鄉村地區的人才外流，包括社會工作人力。進而鄉村地區缺乏教育機會，讓不同團體的教育參與出現落差，特別是原住民。這次的發表著重於夏威夷大學藉由提供鄉村島嶼社會工作碩士學程的遠距教學，藉以保有社區人力和講求教育和服務管道均等的社會公平議題。此研究針對第一和第二批畢業生（合計 49 位）進行系友問卷調查，有著高畢業率和低耗損率，是夏威夷大學在地生高報到率的方案之一。95% 以上的畢業生還維持住在社區和在當地的鄉村社區工作，許多人準備證照考試中。進而，職涯分析顯示這些畢業生承諾留在州內工作，也有高比率（10%）承諾於服務在地島上夏威夷原住民的機構。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工作碩士的遠距教育方案可以成功地增進留住鄉村地區的有訓練的專業者，及避免移住都市接受教育。結果亦顯示學生選擇服務聯邦和州政府的工作機會時，也有許多人移向服務在地人群。

全球知識發展的交流

由瑞典與南非合作提報的在全球知識發展的交流論文中，由南非 Ford Hare 大學與中瑞典大學的社會工作教育方案建立夥伴關係，七年前開始交換老師與學生。整體而言，12 位老師和 19 位學生參與交換方案。每所大學的學生選修交換大學的課程並參與臨床訓練。教師在交換大學中有不同程度的教學。交換方案標的在於發展增進相互知識發展和更多社會-文化理解的學生與老師的交換形式。方法/實行訪談兩所大學參與交換的學生和教師。結果顯示學生表述受到招待國

家非常好的照顧。與其他學生的融入也進行得非常良好。學生所經驗的挑戰是語言，開始時會有困難適應與傳統和教育體系有關的不同議題，以及不同大學之間缺乏溝通。兩所大學的學生指出在交換開始之前的小心準備是重要的。也點出因著不同學期課程實行交換的實際困難。大學教師指出，合作引領接觸不同的實務領域的新方案，以及與現有夥伴的深度合作。整體而言，是增進國外實務的品質。接受到交換訊息的其他大學看待這樣的經驗是正向的，他們自己也規劃相近似的發展模式，可以創造新的多元伙伴的機會。重要的調查顯示，超過 30% 的學生經驗國外的實習之後，從事國際性的工作，或是尋找國際性的工作機會。大多數學生也相信國際實務有助於增進他們的就業力，過半數接受訪談的學生相信國際性的實務對他們當今的工作條件或經驗有助益。國外實習也大大地貢獻來強化學生對國際發展議題的承諾。

增進非洲的發展性社會工作教育觀點：實務實習的革新取徑案例

全球社會工作教育有著課堂指引與實務實習元素的共同課程。這兩種元素對於任何社會工作教育機構產出優質的專業者是很重要的。在非洲部分，過去的幾十年間要求社會工作教育與訓練更為適切與相關，也見得許多機構以社會發展觀點來探究課程發展。特別是在東非與南非一些國家中的學術機構，已經努力讓課程和課堂學習更趨近地方需求。2008-9 年間由南非與東非的約翰尼斯堡大學、玻斯瓦納大學和國立利所薩大學，包涵 25 所社會工作教育與訓練機構的合作研究，在次區域間有關社會發展取向的社會工作教育是有著正向趨勢。然而同個研究中也指出，這些學術機構在影響社會發展取向中適切的實務實習訓練，是面臨著重大挑戰。包括缺乏訓練有素的田野督導，缺乏相關的領域實習機構，實習實作元素的時機問題，以及機構督導的品質不佳。本文檢視這些機構所面對困境的本質和規模，並建議革新策略用來對應這些困境。所建議的革新取徑包括引介「流動」安置、工作坊、「村落營」、和「社區中心」安置等，以對應缺乏適切的實習安置問題。雖然需要針對地方特質做些小調整，本文指出一些這樣的策略已在其他地方實行成功，進而建議如何對應其他主要的挑戰。

撰稿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安東尼組長

場次： WS 117

主題： Prevention for children at risk

危機兒少保護 英國大學教授 Debbie Watson, School for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2200 個母親從他們的懷孕到孩子 2 歲就跟隨他們，發現有托兒所服務對媽媽們很重要，看到對他們孩子的好處。另外，團體活動對孩子成長也很重要，尤其行為偏差孩子有莫大幫助，但有些媽媽會說之前去參加團體被拒絕，因此不想去參加，那是因為他們的孩子有些問題，如罵髒話，其他父母會有意見，所以不想去參加團體活動，引起惡性循環。故中心需要出去接觸這些家庭，幫助他們發展潛能，但如何進每個家門也是一個難題，大部分社工說實在沒時間去外展，鼓勵他們參加活動。

撰稿人：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任麗華老師

場次：WS118:4

主題：家長參與智能障礙兒童個別化教育計畫—以立陶宛經驗為例

報告人：Ruskus, Jonas(立陶宛 Vytautas Magnus 大學社工系)

本研究探討立陶宛父母參與其智能障礙子女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情形，作者討論立陶宛父母參與子女教育之議題。個別化教育計畫被視為是鼓勵父母參與其子女教育及創造與所有參與者平等合作的機制。由比利時研究者 (Detraux,2002;Detraux & Di Duca,2006)所發展出的 Bientraitance 概念，在本研究中是一種實施於特殊教育學校的研究介入概念。行動研究中的參與式研究為本研究的方法，目的為要建構家長和專業團隊人員之間的向心力，藉由坦承家長與專業團隊人員間不同的需求與興趣之衝突，比彼此面對、溝通及妥協來達到家長與專業人員間共同擬定的目標，並將此目標藉由行動化計畫來合作完成。本研究結果顯示，個別化教育計畫能幫助所有的參與者(達到對共同目標的了解、發展出共同的認知)、實行內在的資源、創造創新的機構式文化、促進家長的期待並開放家長與教育者間的挑戰。

撰稿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戴世政博士候選人

場次：WS 125

主題：Transform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V

當天口頭發表4篇：

WS125:1 Building professional capital: New Zealand social workers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Beddoe, Liz (New Zealand)

WS125:3 From school to the real world -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PD) in the social work education

Kesthely, Martha (Sweden)

WS125:4 Practice learning in Cyprus under development

Cochliou, Despina (Cyprus); Spaneas, Stefanos (Cyprus)

WS125:7 The neglected agenda of social work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Engelbrecht, Lambert (South Africa)

原訂下列 3 篇口頭發表取消：

WS125:2 Impact of dual degree MSW/MBA program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Martha, Vungkhanching (United States)

WS125:5 Teaching work and training in social work in Brazil: challenges for ABEPSS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Benatti, Lucimara (Brazil)

WS125:6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in social work, fact or fiction? An experience in analysis

Rodrigues, Marlene Bráz (Portugal)

發表內容摘要：

此場次主題為轉變中的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發表的四篇文章作者分別來自：紐西蘭、瑞典、賽普勒斯和南非，討論的焦點在於社會工作的專業教育和專業資產的建置，包括的議題範疇由正式的學校的教育，到專業社會工作教育和督導機制，各篇的重點摘記如下：

WS125:這一篇文章的作者來自紐西蘭的奧克蘭大學，主要在於討論社會工作領域中專業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的建立，作者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收集社會工作者參與繼續教育訓練的意見，主要的發現為：機構在社會工作者專業繼續教育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機構會影響社會工作者如何建立他們的專業資本，然目前紐西蘭的機構和公開的社會機制，仍然未能提供足夠的訓練機會，來有系統地累積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資本，社會工作者仍然為爭取更多資源投入，來進行專業

繼續教育而奮戰。

WS125:3 本文作者提出正規大學社會工作教育中，教學應該囊括個人和專業發展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簡稱 PPD) 的觀點，主張每個學生都應該有自身的觀點來說明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作者整理一些被認為歸屬於有助個人和專業發展的課程安排，包含：閱讀期刊、反省的團體、關於自我知識的特殊課程以及研究團體等。並以瑞典要求學生閱讀期刊為例，說明學生閱讀期刊所帶來的好處至少包含幫助寫作與發表、增進批判性思考、提供深刻的反省，以及作為實務工作的基礎等優點，最後並鼓勵大家精進社會工作教育。

WS125:4 本文作者來自賽普勒斯，其整理多年擔任學校督導的經驗發現：賽普勒斯的社會工作還在未開發的階段，在 2001 年才有學者從希臘、英國和美國就讀社會工作系所畢業後返國開始建置第一個社會工作系，其後分別到了 2005 年和 2009 年才有第二和第三所社會工作系，且迄今尚未有任何專業督導訓練機制。作者倡議賽普勒斯目前極為需要的是發展實務學習的模式，特別是與在地文化議題有關的工作，像是原住民服務等部分，來幫助社會工作系學生的實務學習。

WS125:7 作者進行研究的議題為社會工作督導與社會工作管理，同時提供一個有趣的問題：一個社會工作督導，也可以同時是管理者嗎？作者針對南非 31 名社工和 29 名督導人員進行研究，透過質和量的分析發現，這一群平均註冊執業 17 年的社會工作者都指出瞭督導在管理上的挑戰，例如：如何去了解新進社會工作者的學習架構和脈絡、如何去增進所帶領社會工作者的優勢、如何去整合理論到方案和實務中，甚至督導也需要永遠會做所帶領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等課題，都顯示出社會工作領域中督導在管理工作上，被期待需要更多組織的能力、整合與互動的觀點，以及可以參照的督導模式。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羅秀華老師

場次：WS138

主題：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 (社會發展與社工的角色)

**社會工作者如何永續地與多重問題案主工作：
PAB (Personal Archive Box) 技巧的威力**

PAB 技巧開發於 2000 年，也成功地測試在荷蘭的多重問題案主身上。社會工作者如何有效地與案主一起工作，並協助處理他們多元生活壓力源的「容器」？社會工作者如何在這樣的容器案例中永續工作，協助案主不僅減少他們的多元負擔，也協助他們充權，以永續方式對應新的生活壓力源？荷蘭社會工作者運用 PAB 工具在多元問題案主情境。雖然多元負擔從一開始看來是太沉重得無法處理，不僅是案主，社會工作者亦然，社會工作者表示真的有進展。若面對像貧窮、住宅問題、離婚、虐待、死亡和垂死等，帶著 PAB 的社會工作者知道該如何行事。可以永續工作，做為社會工作者帶著 PAB，藉由全觀多元壓力情境，協助逐步地減少不健康的壓力源，並充權案主和他的環境。PAB 在「容器-案例」是有力的工具，及技巧歸屬於「永續社會工作的工具箱」。PAB 確保個人和社會的充權，表面上是症狀的解除，實則是症狀的重現。研究者在他的工作坊中示範 PAB，顯現荷蘭社會工作者運用 PAB 的經驗。

從日本地震的學習功課：社會工作者在防救災準備中的角色

研究目的：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46:18 的九級地震震撼日本海岸線，是有史以來最慘重的地震災害和千年大海嘯。至少 15,833 人死亡，3,671 人失蹤。此悲慘事件讓全球社會工作者需要學習更多功課。本文描述因應災害的社工作為，以及社工的防救災準備工作。方法：訪談地震/海嘯受害者來描繪當時的情境。也訪談社會工作者、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警察人員、學生志工、和災害復原的市府官員，以多角度來分析。這些訪談指出地震和海嘯之後的混亂和問題。結論：研究結果發現，社會工作者在防救災準備的角色有 1) 確保疏散中心是所有市民知悉的 2) 確保疏散中心的通訊 (除了電話和網路之外)。3) 準備疏散中心有系統的結構，譬如社區領袖是疏散中心的領導者 4) 災害會嚴重影響個人的生理和精神狀態，對應災害，首先，社會工作者需要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堅韌與強壯，

所有社會工作者就戰備位置。

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職責範疇——瑞典與德國的比較研究案例

從 20 世紀初葉開始，醫務社會工作者是歐洲專業醫院團隊中自然的一環。職責範疇的認知很重要，因為在生物-醫學典範主導的環境中，醫務社會工作者常被看待為「外人」。令人驚訝的是，針對醫務社會工作者的任務與專業化的實證研究是被邊緣化的，有關醫務社會工作的社會工作教育也有所不足。最後，有關一般性的專業化和特殊性的社會工作的跨文化研究也很少。本文比較和分析 1989-2009 年間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個人與集體策略。運用跨文化取徑調查福利國家政權和健康照顧組織對醫務社會工作者職責範疇的影響。研究發問有關於組織和個人所宣稱的任務，兩個國家在全國和地方層級所宣稱的策略，以及使用專業內部與外部關係來促進專業利益。運用專業理論、組織理論與社會認同理論做為分析的理論基礎。有全國層級的質性資料，藉由文件及醫務社工協會的焦點團體。在地方層級訪談德國與瑞典的醫務社會工作者。研究結果顯示，1) 在社工範疇中發展集體的醫務社會工作範疇，2) 轉化這樣的集體範疇到其他的醫療照顧專業/組織，以掌控醫務社會工作的界定，3) 改善正式範疇以保有專業空間。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羅秀華老師

場次：WS154

主題：Community empowerment (社區充權)

社會發展在「共同」空間

占領華爾街的批判聲浪的出現，以及其他許多城市提議全球「占領、連結與創新」的議程，是要抗衡資本家的壟斷。在經濟全球化的陰影底下，社會工作基於公平正義的專業價值底下，如何回應舊的/新的挑戰，以及如何將發展性理念運用開來是重要的。本文著重兩部分的討論。1) 2010年中啟動的社會經濟行動研究方案。2007-2010年間的全球經濟大海嘯，喚醒地方人們重新思考主導香港經濟幾十年的主流經濟樣態。行動研究團隊緊密連結由合作社、公平貿易組織、社區貨幣方案、和社區支持的農業所組成的新的社會經濟聯盟。系列的公共論壇、媒體宣廣、市集、出版方案等來產出變遷衝擊。2) 本文更聚焦於婦女合作社的案例，詮釋這群婦女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在做些甚麼、重述他們的認同、表述他們的尊嚴、加強他們的社會權力。如何轉化受害情境成為積極的機構和凝結其力。討論基於研究這些婦女已有十年的永續零售服務。性別議題、新自由主義的勞動，以及婦女與自我和他人的對話在經濟空間的替選。文章最後，討論香港的福利政策中出現「社會企業」論述之中，發展性社會工作如何充權貧窮婦女。

地方貨幣體系的社區實驗

地方貨幣體系在全球許多社區中有所建構，以回應全球經濟危機。地方貨幣體系主要目的在於社區保有他們的社區金錢，且藉由鼓勵社區居民在地消費來提升地方經濟。儘管有越來越多的社區運用地方貨幣體系做為具體的工具來強化他們的社區經濟，但至今很少談及當今地方貨幣運動的理念與實證研究。因此，此研究目的在於發展理念架構以了解地方貨幣體系的意義。進而，此研究探究建構地方貨幣體系的主要流程和挑戰，藉由在美國 BerkShares 與 Urbana-香檳地區的地方貨幣運動的個案研究。運用對一地方貨幣運動的社會資本理論、Amartya Sen 的能量取徑、Karl Polani 的政治經濟理論和社區經濟發展理論，以發展地方貨幣運動的理論架構。此理論架構提供理解詮釋為何地方貨幣運動有貢獻於增長社區充權與發展。此個案研究成果將提供有效的策略以建構別的社區的地方貨幣體系。

移居/移民在郊區設施的跨領域充權服務模式

新近美國的移民與移居模式和難民安置實務，對郊區社區和小城市產生經濟、社會和文化壓力。一直以來這些社區並未意識到有責任藉由提供基礎教育、工作訓練和語言服務，需要投資在人力資本發展上。有證據顯示，一些發展性的服務乃出於被迫的情境以因應漸增的需求，顯現出其能力不足以應付這些需求。直說對應社會和經濟的公平議題，卻危害移民和難民的安置政策。此研究發現提供一基礎來創新充權為本的跨領域模式，指向在社區中提供服務給住在郊區和小城鎮的拉丁與尼泊爾的移民與難民。運用社區為本的參與式研究模型，使用下述原則來滋養個人與社區充權：看待社區是個認同單元，確認優勢和增進能力建構，長期承諾於社區-大學的合作。此研究蒐集拉丁與尼泊爾移住人口的量化測量資料，以及訪談服務提供者，尼泊爾和拉丁族裔領袖，以及由拉丁和尼泊爾移住人口來主導的，近 200 位的移民與難民參與者的焦點團體的質化資料。如預料中的，增加醫療照顧/社會服務是需求評估的結果。未預期的研究結果是由族裔領袖與焦點團體參與者指出，需要資訊的發送，而在原有的社會工作、護理、醫師助理、和營養學教授和學生之外，增加有專才能建立社會網絡的技術人員。研究結果的重要性有：1) 在需求評估階段運用充權聚焦，確認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族群的優勢，2) 體察移民、移住人口與難民彼此之間細膩的差別。這將有助於和緩需求評估及研究之後的服務發展間的落差。

鄉村-都市聯盟作為災後社區重建的新模式—在中國四川的行動研究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國四川省汶川地震，其災害對社會層面的影響以及重建的挑戰是需要面對的。過去三年中，與地方社區的合作當中，研究者發現傳統的社會工作介入方法，無法真正地滿足在地居民的需要和重建永續的社區生活。研究者嘗試鄉村與都市聯盟的災後社區重建的行動研究模式，不僅指向重建地方生活，也嘗試回應中國大陸主流經濟發展的嚴重問題。研究工作包括發展在五個村落和三個城鎮的五個婦女的縫紉團體。發展生態旅遊和鄉村-都市的公平交易。所有工作在社會工作者、跨領域研究者與地方婦女的合作之下進行。本文聚焦於社會工作者在災害介入的角色，新的介入模式的理論與哲理背景，研究者在過程中所遭逢的挑戰與兩難。

撰稿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戴世政博士候選人

場次：WS 156

主題：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WS156:1 How does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creating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effect citizens with an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 in Denmark

Müller, Maja (Denmark); Enrum, Vibeke Sypli (Denmark)

WS156:2 Third Country Immigrants and challenges for public sector

Parlalis, Stavros (Cyprus)

WS156:3 The social realities of being a foreigner in South Africa

De Kock, Desirée (South Africa)

WS156:5 The new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Tai, Shih-Mei (Taiwan)

WS156:7 Undocumented forced migrants in Botswana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accessing social services:Lessons for the SADC region

Mupedziswa, Rodreck (Botswana)

WS156:8 Imigrant homelessness in Portugal

Libano Monteiro, Teresa (Portugal); Ramalho, Vanda (Portugal)

WS156:9 Globalisation, migration and Nation-states

Herrmann, Peter (Ireland); Eriksson, Bodil (Sweden)

原訂下列 2 篇口頭發表取消：

WS156:4 Forever foreigners: Bias crimes against Asians and Asian-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CA, USA

Stotzer, Rebecca (United States); Hong, Seunghye (United States)

WS156:6 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S

Thomas, Madhavappallil (United States); Choi, Jong (United States)

發表內容摘要：

這個場次的主題是移民的經驗，發表的七篇文章關注在新移民在移入國的生活狀況和移民經驗，談的議題從法令政策的影響、移民的生活情境、移民對社區的觀感，到未入籍前可能遭逢的困境與挑戰等多元內容，本場次的作者們也分別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歐洲的丹麥、賽普勒斯、葡萄牙、愛爾蘭和瑞典，非洲的南非、波紮那共和國，以及一篇來自台灣的發表文章，各篇的重點摘記如下：

WS156:1 作者從政策角度討論丹麥新移民被隔絕與貧窮的現象，作者指出丹麥政

府從今年起執行嚴格限制補助的法案，希望創造更多的經濟誘因使人們投入工作，其中移入丹麥的新移民因此普遍出現貧窮的問題，特別因為身分的限制，而遭逢相當不公平的對待，雖然丹麥政府過去一直以來都在努力減少貧窮，並且增加社會品質，但政府主張「不要再把社會福利當作免費的自助吧」的訊息不斷地釋出，減少現金給付的結果，「社會包容」的口號被「相對剝奪感」和「相對貧窮」所取代，研究發現新移民感受到未繳帳單的壓力和一日無法維繫三餐等現實壓力。

WS156:2 這篇文章的作者本身原來自希臘，但目前在賽普勒斯進行研究，此篇文章就是他來分享在賽普勒斯進行第三世界移民的研究結果，作者於警政、醫院、學校等公務機關發放 1028 份問卷，並進行 100 位公務員的面談，針對移民的現象與需求，來詢問 85 個問題，統計結果發現 45% 的公務員認為在提供服務時確實需要問卷，來進一步了解移入人口的需求，但 49% 的公部門工作者卻不認為在賽普勒斯已經存在有許多的新移民，同時歧視第三世界移民的狀況仍然存在，總結這項研究，作者認為目前的賽普勒斯需要更多的多元文化教育。

WS156:3 本文作者來自南非，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訪談，共計訪談 45 名外籍人士，其中包含 21 名來到南非的外籍配偶，作者詢問這些受訪者為何來到南非？在移民過程遭遇哪些挑戰？與警察、公部門和南非一般公民互動的經驗如何？還有認知到自己身為一個移民在南非的生活水準如何？以及自我對於身為外國人這件事情的情緒感受如何？等問題，結果發現社工提供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對於外國移入者來說相當重要，同時建議南非的政府部門則是應該要聘用與訓練更多具有良好人際溝通技巧和語言能力的工作人員。

WS156:5 來自台灣的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戴世政報告去年與澎湖新住民服務中心合作進行的實務研究結果，這個研究以嫁至台灣澎湖縣的新住民為對象，按鄉市新住民人口比例進行抽樣，透過問卷方式面訪 250 名來自大陸籍及東南亞籍的外籍配偶，詢問其對於所居住在地社區的觀感，研究發現所在的社區不同直接影響新住民的社區觀感、若社區居民對於多元文化的接受度高，則新住民對於社區的環境評價較高，與居民的互動亦較佳，研究也顯示未來服務推動的重要課題，就是要去建立在地社區達人對於新住民的支持網絡。

WS156:7 本文作者來自非洲東部的波紮那共和國，作者表示過去該國經常輸出勞動力人口到南非當契約工，然近年來該國發現鑽石礦後，經濟發展日趨穩定，也出現更多的中產階級，但在此時卻也出現更多來自辛巴威等國的移入人口，且多數是難民、交易商販和尋求工作與觀光的人潮。作者分析來自辛巴威等國的勞動人口有自願，卻也有被迫的非法移入人口，同時進一步比較波紮那和其他南非國

家在受理非法移入人口的經驗，並試圖整理各國在面臨與處理這些問題背後所學習到的事情。

WS156:8 本研究來自於葡萄牙政府部門的委託，針對在葡萄牙國內無家可歸的移民者進行研究，以全國為範圍同時進行質與量的資料蒐集和分析，來確認無家可歸移民者的身分，建立基本的個人檔案，同時深入了解這些移民者為何無家可歸的現象，發現移民者無家可歸的原因，多數為未取得公民身份，同時作者進一步描述移民者的真實生活情境和生活的模式，以期望透過這個研究，讓社會工作者能夠知道無家可歸者的問題與需求，同時在面對移入人口群的議題上，有更多對於歐洲脈絡上的了解。

WS156:9 本文作者採取結構性論述的方式，來串聯全球化、移民和大國家（Nation-States）等三個概念，從較為鉅視的全球化下人口移動，來討論歐盟區和大國家的概念，並且透過全球人口移動的現象，說明歐盟區目前面臨的人口移出與移入的問題，討論目前歐盟區國家在內部整合的議題以及一些適用在歐盟區人口移動上的公約和相關的法令限制。作者倡議應該同時注意到移出國與輸入國兩方社會所發生的變化，需要雙方相互調適，並且應該要積極討論如何在開放國界的同時，將新移入者整合進社會當中，共同將目標置放在更好的一個新的公民社會上。

三、大會工作坊報告內容

撰稿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劉淑瓊老師

場次：S01

主題：聯合國的兒童風險評估觀點與經驗

2012年7月9日第一個 symposium 的主題是「對高風險兒童觀點」。本場次是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兒童保護官員 Kendra Gregson 以”Unicef Assessment Tool Kit”為題發表演說。Ms. Gregson 開宗明義指出，在兒童保護工作中運用評估工具的目的在於，清晰掌握兒保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確定場域中的行動者，瞭解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與關聯性，最後找出可以強化兒保體系的各種行動策略。使用評估工具的過程應先確定三個基本問題—何人(who)、何事(what)、何地(where)，要規劃好誰來做何事、界限為何，同時要依當地的個別需求加以客製化，要誠實面對「我們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需要知道什麼」。除此之外，Ms. Gregson 也提醒在運用評估工具時，以下幾件事具有相當的優先性：

- 法令、政策、規定
- 合作、協調、協力合作
- 能力建構
- 服務與服務輸送機制
- 為促成變遷而溝通、教育及動員
- 財務資源
- 責信機制

最後，Ms. Gregson 以肯亞為例，說明為落實兒童保護所做的系統變革，包括：（一）強化支持兒童保護的法律與政策架構：修正與兒童福祉相關的法令，使立法程序更順暢；（二）改善兒保的組織、管理及行政：釐清角色、責任與夥伴關係；（三）提升兒保福利與服務的可近性與品質，像是工作人員的招募、留任與訓練等；（四）強化司法體系對兒童需求的回應能量：為所有與司法體系互動的兒童提升服務的可近性與品質，例如發展一套對兒童友善的法庭和警政服務等。從肯亞的經驗，她歸納出這本質上是一個典範移轉，應該建構一個涵括正式/非正式關係的系統，建立夥伴合作關係；將兒童保護放到政策議程中；要清楚辨識出哪些因素在驅動著兒保體系，找出對執行結果而言關鍵的政策與政治切入點，以降低外在非預期阻力，提高翼助力量。

撰稿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秦燕老師

場次：S02

主題：健康權與社會公平

健康權與社會公平：由三位重量級人物提出演講，第一位是 Elis Envall，瑞典的 IFSW 理事長，論文主題是“健康權與移民”；第二位是 Damon Barrett，來自美國的學者專家，題目是“藥物使用與人人有權可享的健康標準”；第三位是 Helen Potts，來自澳洲，題目是“健康權與責任”；三位講者由不同角度強調生理、心理一定標準的健康照顧是應該每個人可享有的平等權益，有相關的法規及政策，也有一些促成和拉扯的因素，但所有人包括移民都應享有健康照顧的效益。而政府更有責任讓民眾了解其權益，包含現有、未來甚至可追溯的權益，且應納入政策以便檢視、監控，及設立評估機制，做好責任。

撰稿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翁毓秀老師

場次：S04 工作生活平衡工作坊

主題：發展遲緩兒童母親親職壓力與婚姻滿意研究

本文發表在工作生活平衡工作坊的文章。家庭是兒童不同發展時期最重要的成長地方,父母則是滿足他們需要的提供者。兒童的身心健康是依賴父母來提供充足的環境來滿足他們成長的需要。簡單的說,親職壓力是扮演父母所帶來的壓力,它是壓力來源的一種。由於母親通常是主要照顧者,所以母親常成為研究的對象。照顧一般正常兒童已是件相當艱難的工作,照顧特殊兒童會是件令人喘不過氣來與挫折的工作。本研究中的親職壓力是運用親職壓力量表(Parental Stress Index)測量得來。婚姻滿意度則是由婚姻滿意量表(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的測量所得,婚姻滿意是測量婚姻關係與婚姻互動。從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而言,高親職壓力會影響家庭成員的互動,包括夫妻、親子及手足等互動關係。照顧發展遲緩兒童會產生高親職壓力,而高婚姻滿意可能有助於降低親職壓力,但是低婚姻滿意則可能加深親職壓力。

本研究是量化研究,運用問卷來收集所需研究資料。研究對象是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由於研究對象特殊,尋找適當對象的過程十分艱難,也造成研究對象較少。本研究試圖回答三個問題: 1. 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其親職壓力如何? 2. 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其婚姻滿意度如何? 3. 親職壓力與婚姻滿意的影響因素為何? 4. 這些母親的親職壓力與婚姻滿意的關係如何?

研究結果:一、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其親職壓力的平均數為 273.57,正常範圍是 204—278。可見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的親職壓力雖然仍在正常範圍內,但已偏高且已接近上限,值得關切。二、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的婚姻滿意平均數為 200.23,平均數低於 206 代表有些次量表是不滿意的,平均數高於 235 則代表有些次量表是特別滿意的。研究結果顯示,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的婚姻滿意在某些次量表上是較不滿意的。三、差異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家庭經濟狀況與全職工作人數對親職壓力是重要因素; 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家庭經濟對婚姻滿意是重要影響因素。由研究結果可見,家庭經濟對親職壓力與婚姻滿意都是重要影響因素。四、親職壓力與婚姻滿意呈負相關, Pearson 相關係數為-0.447,也就是說親職壓力越高,婚姻滿意越低。

研究建議:一、提供諮商服務與親職教育給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 二、邀請父親參與發展遲緩兒童的照顧; 三、組成支持團體與建構支持網絡; 四、提供喘息服務; 五、特別關注家有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林桂碧老師

場次：S10

主題：The Insecurity of European Social Security

1. Why the EU needs a Social Pact. (Austria)
2. Managing Change : from Institutional to Community Care. The European Social Network-public social services in Europe. (United Kingdom)
3. Economization & Marketization. Public Procurement Law and Social services. (Austria)

此一單元的討論會主題是歐洲社會安全的不安全，共有三篇報告：第一，歐盟為何需要社會契約（Social Pact）？因為 1.有 2 千萬貧窮人口，2.需要投資和穩定就業，3.需要投入教育訓練，4.需要社會與健康服務，5.增加住宅供給量，6.由市民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和作決定。所以必須具有新的觀點，1.產生同盟，2.統御和經濟，3.建立社會 inclusion，4.促進就業。第二，從機構照顧到社區照顧，談歐洲的社會網絡——一種公共社會服務。歐洲的社會網絡係以就業和社會連結支持社區方案，政策決定和地方照顧實務的橋樑。有效的管理社區照顧的要素有：1.需求評估與規劃，2.資訊和報導，3.個人需求評估，4.可運用的服務量，5.選擇，6.對於檢查和改善的品質保證，7.建立社會 inclusion。第三，從公共採購法和社會服務，探討服務經濟化和市場化。首先談到社會服務的特徵，其次是介紹社會服務公共採購法之內容，最後是說明社會服務公共採購法的效果，包括減少社會服務的量、改變不穩定的就業、限制個人偏好、社會服務標準化...等。

撰稿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翁毓秀老師

場次：S12

主題：瑞典社會福利現況

瑞典現況(一):社會工作在全球化下改變中的社會

這個討論會有四篇文章報告其中三篇對我們了解瑞典這個現代的福利國(welfare state)非常有幫助,值得介紹。

全球化與地方化交織下的照顧工作 (Johansson, Stina, Professor in Social Work,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二次大戰之後到 1970 中葉之前,瑞典的移民主要是因為勞動力市場的需要。1970 年代之後的移民則多為難民。這些移民以各種方式與程度融入瑞典的福利社會。許多移民來到瑞典時可能是為了照顧他人而換得工作機會,但是現在他們自己都已到了依賴與需要他人照顧的年齡。瑞典在此過程中,經由立法來保障多元化,過程中照顧工作持續執行著,形成移民與老年人互動的不同組合。2009 年通過兩項促進老年照顧多元性新的瑞典法案,即反歧視法案(Anti-discrimination Act)與單一語言法(A language Act)。這兩個法案都使用公民權,尤其是歸屬、包容與特殊需求等概念。瑞典兩個數量相當但是不同的少數民族:一個是原住民薩米族(Sami),他們的語言最近升格為瑞典國家的少數語言,另一個團體代表 1970 年代以來的移民,越南人,這兩個例子將是多元政策的代表。這是兩個不同的少數團體,成員數量相似,但是代表兩種文化參與公共事務的不同態度。有 15%受雇於老人照顧領域的工作者是在瑞典以外地方出生的一相較於其他領域是偏高的。這些照顧者有相當顯著的比例是女性。移民女性願意接受的工作條件是一般瑞典人不願意接受的。結論是即使多元化在瑞典福利體系已成為政治工具,但是在地方老人照顧行政裡存在著同質化的論述。社會工作者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老人的貧窮問題。兩個少數團體都提到語言的重要性,研究文獻回顧凸顯了語言的多層次功能。協商過程中出現與福利有關的價值,例如平等、正義、包容、排除與照顧工作都會被討論。

從‘福利國’到‘福利社會’? 瑞典 自願組織的倡導與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Johansson, Håkan, Professor in Social Work,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福利國通常被描述為包容的與普及的福利型態,主要是公共財務提供與公共提供福利服務及社會安全福利。自願組織很少扮演普遍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他們是扮演倡導,提供各類公民集體意識、使他們的‘訴求’被決策者聽到及影響社

會規範。這種組織化的角色似乎成為一個主流。最近由自由—保守政府所設置的‘自由選擇系統’法案,鼓勵消費者—公民權模式在社會服務、醫療服務與就業服務上的發展,直接支持不—為營利服務提供者的發展(Lagen om Valfrihetsystem)。我們在瑞典的都會區發現這樣的趨勢,越來越多將福利服務拿出來投標,邀請自願組織與私人營利提供者來競標。除此之外,對自願組織的財務支援多朝向滿足大眾需要與政治上所定義的用途(‘價值為金錢’)及較少是為組織的發展。這似乎是規範了從‘聲援到服務’的轉移,但同時,中央與地方政府持續強調自願組織的角色是提供公民一種‘聲音’,例如強調已存在的及創造新的論壇、委員會、公民對話、提供自願組織參與的可能、與政治人物及主要決策者討論與對話。近來瑞典政府與來自廣泛的自願組織代表,在共同的權利與義務上,共同發展出一項合約(Compact)。這些重疊與部分衝突的趨勢產生自願組織在瑞典福利國角色的問題,例如如何指出我們逐步從社會民主的‘福利國’轉變成為‘福利社會’,在福利社會裡,公共、私人(為營利)與自願非營利組織,以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滿足彼此。這篇文章詳細檢視了過去10年策略性地選擇改革(例如瑞典合約的發展與自由選擇系統法案)及以現有的自願組織服務提供者的統計資料與改革的資料做對照。

這篇文章從瑞典自願組織在福利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探索瑞典的福利國之社會福利體系的運作面臨實質上的改變,對於了解目前的福利國社會制度有很大的幫助。

瑞典的兒童貧窮與家庭政策—漂浮的普及性 (Salonen, Tapio, Professor in Social Work, Malmö University, Sweden)

這篇文章焦點放在討論富裕社會如瑞典之兒童貧窮程度的改變。自1990年代以來的經濟的脆弱程度與內涵對兒童及其家庭的影響。同時,兒童權益問題在政治性與規範性的推波助瀾,及遵循UNCRC(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下,證據顯示越來越多的不平等與相對貧窮也出現在家中有子女的家庭。UNCRC訂定了設立與發展強化兒童權利的政策與實務架構。實施上與學術上的辯論大部分聚焦在兒童參與的權利,較少關注在貧窮是與參與有關的討論上。本文第一個部分討論強調積極公民的父母通常並不能夠帶來兒童權利的改善。許多孩子在貧窮中是因為積極公民的父母關注在成人生活上,未注意兒童的需求與權利上。第二個部分,包括完整的實證分析兩個瑞典家庭政策的典型目標,例如家戶的減少貧窮與重分配。在一個普遍發生收入不平等與公共財政困難的狀況下,如何達成這些目標?結果顯示,自從1990年代,對於兒童與其家庭的收入保障與重分配,瑞典很顯然的是漂浮的普及化(drifting universalism)。當然,對於有抱負要保護與增進貧窮兒童與其家庭生活狀況的社會工作者而言,具有深刻的影響。

瑞典現況(二):社會工作如何回應弱勢族群

這個討論會有四篇文章,社會工作分別回應了兒童權益、青少年犯罪、精神疾病及老人照顧等弱勢族群的問題,值得台灣社會工作參考。

兒童的觀點看兒童參與家庭法律訴訟 (Eriksson, Maria,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ociology,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這篇文章探討弱勢的瑞典兒童如何自己在家庭法律訴訟過程中尋找與協商參與的問題。以主題結構的方式訪談父親對母親施暴,而且已與社會工作者會談過的兒童。這些兒童正在經歷有關監護權、住處與如何會面的法律衝突過程。研究分析重新建構這些兒童如何面對他們的社會工作者及他們如何運用他們所覺知到的空間來採取行動。在這些狀況下一兒童或多或少都有準備—至少在某個程度上可被視為是有意圖的。因此,策略的概念似乎是恰當的:不論是有行動或是沒行動都是有目的的。本文中概述了兒童們的策略、討論了在會談裡,這些不同的兒童策略可能與兒童對參與的看法有關、及這些兒童策略與看法間的連結能夠告訴我們,他們在困難的生命脈絡裡的參與。從上述的分析概要所獲得的初步結論是研究結論與之前的實務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接受訪談的兒童樣本似乎傾向較少強調共同的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而較重視“為自己(for yourself)”決定的權利。這樣的傾向可能可以連結至過去的暴力經驗與/或來自父母(父親)與/或來自社會工作者的壓迫。另一項觀察是兒童清楚地或隱含地描述他們對別人怎麼跟他們對話的方式表達抗議,這些兒童幾乎是獨自地在這件事上決定了參與的原則。

社會動員或街頭犯罪: 現代瑞典青少年都會棄兒的兩個策略 (Lalander, Philip, Malmö University, Sweden)

本文探討現代瑞典所經歷邊緣化與隔離的形式,這轉變原來的福利國,而朝向提高了不同社會團體間的隔離與不平等的情形。本文是以民族誌的方法探討與分析都會區裡被標籤的青少年。199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新形式的貧窮在瑞典多種族大都會區之郊區出現與成長。過去的20年來,雷鬼搖滾樂(Reggae)與嘻哈(Hip hop)的青少年次文化吸引了許多青少年到這些大都會地區。這篇文章聚焦在兩個大都會區的兩個青少年族群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適應歧視、次等公民、與區域標籤化的現象。在此兩個團體裡可以看到非正式的學習過程、深植在青少年團體文化裡及從與美非(African-American)音樂文化的連結而增權,使得這些團體與個人能夠表達自己。其中一個大都會郊區的青少年團體清楚說明了對社會及政治的批評,可以比擬20世紀早期的由文化引發的勞工運動。來自另一個社區的青少年團體對犯罪違法有強力的吸引力,未能與另一個團體一樣自己說明清楚。然而,他們的文化表達也需要被了解,才能夠處理他們所位居的邊緣移民青少年地位。

超越照顧典範—為精障人在社區裡發展參與有關的服務 (Lindqvist, Rafael, Professor in Social Work,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Rosenberg, David, Associate Professor,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雖然 1995 年的瑞典精神衛生改革與社會服務法(Social Services Law),強調復健及與“其他人”一樣能參與社區生活,但是發展復原取向的復健服務卻進行得相當緩慢。重要障礙之一是社會福利的圖像是片斷的,由許多機構各有不同的規定、任務與不同教育背景的工作人員。組織的邏輯是每個機構只能照顧在他們服務範圍內的案主;個人的需要被“劃分(compartmentalized)”如同個人成為一個或多個系統的案主。作者們提出詢問: 是否綜合社會福利系統能夠重新定義服務結構與專業文化,使得能夠建構個人尋求協助的經驗。

在最近完成的全國性研究計畫,其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個人經歷的精神障礙與福利系統結構間是否能配合。結果發現 50%的受訪者,曾與服務提供者面談,但是文件資料顯示他們避免與正式的精神衛生服務人員接觸。在很多狀況下,他們替代地運用一般的社區服務來滿足他們自己定義的需求,以支持他們更積極地參與社區生活。就業、學業、社交與其他自然的社區參與並未在精神衛生系統中受到支持。精神衛生系統對需求的分類是以醫療基礎的照顧典範來分類。需求的範圍與參與社區生活有關,包括復原的可能性,在照顧的典範裡並未受到充分的討論。缺乏復健與復原取向的服務也是大多數現行案主的狀況。結論是精神復健的知識能夠運用在分析與解釋個人在與傳統精神衛生服務的協商狀況上。

瑞典老人照顧的發展與對照顧人員能力與教育的影響 (Ahnlund, Petra, PhD in Social Work,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自 1980 年代以來,瑞典老人照顧的發展可以摘要為正規化(informalisation)、醫療化(medicalisation)與市場取向(market orientation)。正規化代表較少老人接受正式協助,許多老人需要依賴家庭或友人來管理日常生活。因此,結果接受服務的多半是較老的、病得較嚴重的或是老人癡呆症的。老人照顧變成強烈的醫療化。社會的變遷也帶來市場取向,使得私人機構有可能參與老人照顧。過去 10 年我們發現來自私人機構的服務提供者大量地增加。在瑞典的中央行政階層,照顧工作是一個複雜的工作項目,工作人員需要特殊的資格。在老人照顧領域,訓練與資格的問題形成中央工作者高度重視的議題。根據瑞典國家健康與福利委員會,人力資源與工作人員的教育水準是追求高品質的老人照顧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老人照顧工作人員的教育、背景與工作環境等部份是既巨大且多面向的。例如,不是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具有所要求的能力及許多不是在瑞典出生的人在這個領域工作。雖然目標陳述: 所有照顧工作者都應該有相同的教育,是很難達到的。在這項新的研究裡,我們分析老人照顧的發展與其對工作人員能力與教育影響的問題,及檢視對老人照顧領域裡對老人及勞動力的影響。

撰稿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林珍珍老師

場次：SW 12

主題： Swedish standing symposium

1. 在家事法庭過程中的兒童參與

本研究是以兒童的觀點來看 family law proceeding 中的兒童參與問題。所謂的兒童觀點是指在這過程中兒童如何得到訊息 被提供消息和如何在過程中分享自己的意見和決定的權利等等。在之中兒童的行為可能是不滿的 抗議的或是合作的或順從的。之中要特別注意是否兒童有否感受到被社工或父母強迫，是否有被視為主體。

2. 精神病者的照顧模式的轉換

在社會政策的改革之下，服務延伸到地方，但是值得注意以下現象, a 制度的壓制會阻礙身心障礙者接受服務, b 對組織應做新制度主義的組織分析，以了解組織的運作 c 在身心障礙者和社會參與之間存在著灰色地帶。在整個評估過程中，少有個人的聲音，以及發展有效的方法來符應個人的願望。過程的決定也未加入個的人參與。另外測量的方式多是以服務提供的模式來測量。

3. 瑞典的老人照顧

瑞典需要大量的人員投入長期照顧的行列，包含了協助照顧者 護士和護士助理。在九零年後醫院的老人減少，投注的成本轉為挹注在照顧員上面。就市場來說，由於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影響，也著在社區照 顧和照顧者教育。但是該教育這些照顧人員什麼？投在老人照顧的人員應具有何種能力？應有何種工作環境？何時在政策上才會針對這些問題來討論？卻是目前沒有受到關注的重要議題。

肆、機構參訪心得

撰稿人：長榮大學社會工作系 卓春英老師

1.失智老人中心參訪紀實

7/10 日下午在大會的安排下，我選擇參與老人機構的參觀訪問行程，繳費之後，在穿著黃色 T 大會志工的帶領下，25 位左右的各國代表搭乘巴士到斯德哥爾摩鎮上，首先參觀一家 NGO 經營的失智老人中心，中心的設計很新穎，色彩很鮮豔，每一樓層有 9 位居民，2 位照顧者，失智老人每人單獨擁有一房，老人可擺飾其家中原有的傢俱，讓老人有熟悉的感覺，每層樓也設有交誼廳教室餐廳等公共設施，參觀當日正巧有義工來帶領老人製作蛋糕，從拿攪拌器打蛋開始學習，明亮的空間，溫馨的設計，加上人性化的服務，讓人感受到瑞典失智老人被有尊嚴的對待和照顧。

2.老人之家參訪紀實

緊接著第二站，我們來到郊區海邊的老人之家，廣大的社區庭院，花木扶疏，百花爭豔，猶如世外桃源，家家戶戶的陽台佈置得美輪美奐，令人讚嘆。

接待我們的老太太其實也是住戶，據他說明欲入住者大約許繳交台幣 5-6 百萬的屋款，另需繳交每月管理費 2 萬左右，房子可自由轉售，居民也可於社區從事服務，其服務時數可抵繳部份管理費。接待我們的太太徵得先生同意，很大方的帶領我們參觀他的住家，臥房起居室餐廳客廳一應俱全，雅致溫馨的佈置，令人讚不絕口。社區也設有公共圖書室、活動中心、餐廳、交誼廳等空間，定期或不定期舉辦活動，讓社區居民有交流的機會與空間。在如此怡人幽居的環境裡，感受到瑞典老人可以獨立、自主、自由、又有尊嚴的安享晚年。

撰稿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淑容老師

此次研討會計參觀三個機構，分述如下：

1 第一個參觀的機構是「Jobbtorg Stockholm」。

Jobbtorg 是 square 的意思。Jobbtorg 或可翻譯為「斯德哥爾摩就業站或就業廣場」。Jobbtorg Stockholm 的目的是提供單一窗口，幫助社會救助的領受者能進入就業市場。重點放在透過工作與學習，使其能就業、參與社會並走向獨立自主。在斯德哥爾摩有六個就業站，此中心主要負責青年就業。Stockholm 有 3.5% 的人依賴福利維生，其中 50% 的人是因為失業造成的，這些失業人口也就是就業站服務的標的人口群。Jobbtorg Stockholm 主管機關在國家層級為 The Swedish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在市的層級是 The Labour Market Administration。Jobbtorg Stockholm 共有 350 名工作人員，遍佈在不同的組織。此中心標榜「一個窗口：不同需求與不同解決方案」。主要的服務對象是：(1) 18-29 歲依賴福利且失業或未就業的青年；(2) 在 SFI (Swedish tuition for immigrants) 研讀的移民青少年；(3) 有特殊需求的青少年 (Youth with special needs)；(4) 16-19 歲的中輟生。通常每個參與者進到機構以後，就會有一個屬於他的個人教練 (personal coach)，於 5 天內和他討論出一個個別化的工作計畫 (job plan)。2011 年共有 1700 名青少年接受服務，80% 在一年內都走向獨立自主。70% 離開就業服務站半年後脫離福利，但是仍有 30% 的人在福利中停留較長的時間。

該中心還有一些子計畫方案包括 MERIT、FILUR，以及 Youth Jobs within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簡報後工作人員帶我們參觀機構內的設施。有趣的是他們把每個房間都以世界各地命名，連時鐘都展示世界各國的時間，一副在一個世界級的跨國機構工作的樣子。會後開放討論時間大家發言非常熱烈。可見「由福利到工作」(from welfare to work)，是個世界的趨勢，也是各國目前都很夯的議題。

我問了兩個問題並給了一個回饋，一個問題是他們方案短期 (半年) 的成效看起來很不錯，但是不知這些年輕人就業的持續性如何？有沒有做較長期性的追蹤評估，主任坦承他們沒有做更長期的追蹤。另一個問題是他們有沒有如美國的做法對社會救助領受者有五年的期限，如五年後沒能找到工作就中斷他們的福利給付。主任回答他們沒有這種時間上的限制以及類似的做法。我想沒有類似控制式與懲罰式的做法，這也許就是瑞典作為福利國家典範的精神之所在吧。我的一個回饋是說這個工作站的人看起來都很樂在工作，有著很棒的團隊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他們聽了都很開心，主任還直說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有最棒的工作團隊。

2. 第二個機構是一個新移民倡議的機構。

這個機構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以前主要在濟助窮人。近幾年機構中心工作轉為為尋求庇護的新移民提供諮詢及倡議的工作。每年有相當多的人無法取得合法居留的身分，機構的主要工作及在協助他們準備會談（那些該強調、那些不要提）以及準備相關的證件，以協助他們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主任做了簡短的說明後即開放發言。讓大家感興趣的是來機構尋求協助者當中有一定比率是沒有家長陪同的孩子，他們如何來到瑞典？主任解釋許多身處第三世界國家的家長為了小孩能獲得較好的環境與生存機會，會用盡各種方法將小孩送來瑞典，這些小孩通常以有一些親友在瑞典，而這些小孩通常是他們優先服務的對象。來自香港的訪者問到關於他們機構的基金來源，來自韓國的訪者提到倡議與社會工作有何相關？這不是法律或政治領域的工作嗎？而來自加拿大的訪者則說在加拿大倡議是社會工作非常核心的工作。我提問說我知道瑞典是國際上對新移民最慷慨的國家之一。就我所之新移民佔瑞典約 14% 的人口（相對於挪威的 4% 與芬蘭的 1%），問她們對移民有無額度的限制，她說基本上沒有，她們對每一個需要的人提供協助。她說移民的問題主要在於他們為了工作機會，喜歡留在像斯德哥爾摩一樣的都會區，不肯往較鄉間的區域遷移，而斯德哥爾摩等城市已面臨過度飽和的問題。這個機構位在市中心區某棟建築的一樓，基本上是一個辦公室，除接待我們的會議間（平常是用餐的地方），與門口的接待區，其餘為一間一間的辦公室，作為社會工作者提供求助者個別諮詢會談用。

3. Crossroad—此為一在歐盟首創之以歐盟會員國流落瑞典之遊民為對象的服務機構。

我因在 7 月 11 日上午場次研討會中聽到 Crossroad 主任 Arto Moksunen 報告”Crossroad: combating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among migrants in Stockholm”。就主動與他相約於隔日。他展開長假的前一天前往參觀。同行的尚有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江綺雯局長、家扶基金會社工處蕭棕琦處長、師大王永慈教授以及介惠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曾巧忻秘書長。該機構為歐盟首創的實驗性方案，甫於 2011 年 3 月 1 日成立。母機構為 Stockholms Stadsmission，是瑞典斯德哥爾摩提供遊民服務的主要機構。Crossroad 主要是服務非瑞典籍歐盟國家無家可歸的移民（具體而言，為歐盟其他國家的公民以及非歐洲及但已取得歐盟國家永久居留權者）。瑞典遊民則另由 Stockholms Stadsmission 其他子機構提供協助。Crossroad 位在斯德哥爾模市區搭捷運約半小時處。位在一棟建築的一樓，約有 150 坪。內部設施有餐廳、浴室、洗衣間、休憩間（該中心並無提供住宿，但有沙發可暫供休息）、衣服儲藏室、電腦間、上課區、諮詢室、會議室及輔導員辦公室。該中心典型的一天是上午 8:30 左右對外開放，提供遊民免費的早餐、午餐、盥洗、洗衣、.休憩、電腦上網、諮詢等服務；下午則不再對外開放，而保

留對事先預約的遊民做個別諮詢(討論個人的行動計畫),以及上課(語言課程及其他各種課程)之用。該機構編制共有一名主任、5名輔導員、1名兼職律師及一名兼職心理師,以及160多名志工。並以十二種歐洲語言提供服務。中心經費60%來自歐盟,40%來自瑞典官方及民間機構。

該中心每日約服務70-150名街友,據統計去年3-12月,共服務了來自78個國家,約1500名的街友。其中92.6%為男子,7.4%為女生。55%來自歐盟國家、45%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其教育程度15%高中以下、70%為職校、15%為大學;主要的工作為建築工、木工、機械工人;主要的需求為工作與住屋。Arto Moksunen主任雖對中心約滿後能不能持續有點忐忑,但還是有信心的說該中心績效卓越,應可於計畫結束後續獲補助,且預計此實驗服務模式將會在其他歐盟國家逐步推展。比較有爭議的是,不若瑞典遊民,政府於2007-2009年提出協助無家可歸者策略(the Government's Homelessness Strategy 2007-2009),其目標之一為「保證每個人頭上都有片屋頂」(everyone shall be guaranteed a roof over his or her head),瑞典因此露宿街頭人數大減;但瑞典政府基於經費考量尚未能對歐盟會員國流落瑞典街頭的遊民提供類似的住宿服務,故此批遊民仍多露宿街頭,住在公共空間或帳棚裡。Arto Moksunen主任亦承認這是兩難的問題,沒有人喜歡露宿街頭因其意味著不安全與無通訊住址,故有屋可住是個急切的問題;但是若增加住宿安置將使瑞典相關福利經費激增,且瑞典的移民人數也很可能會因此大幅成長。

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個中心窗明几淨,Arto Moksunen主任都稱遊民為participant(參與者),非常正向的看待這群遊民。這裡的遊民看起來於一般人無異,他們的來去自如十分自由,享有中心提供的免費的早午餐與各項服務,且受到相當尊重的對待。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瑞典對於遊民的服務與安置是內外有別的:對於瑞典籍遊民基於「每個人頭上都有片屋頂」的策略,儘可能的予以安置(根據2011瑞典的官方統計,在過去五年中,露宿街頭遊民降到在全國43,000遊民中只佔280名,其餘均已獲安置或住屋安排);而非瑞典國籍之遊民則還是只能任其露宿街頭,而僅提供住宿以外的支持性的服務。

伍、心得與結論

撰稿人：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王金英執行長

一、前言

此次的國際會議其實係由『社會政策』、『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學術教育』等三個領域歷經多年的磨合，因而同意聯合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因此包括學術界，提供直接服務的實務界，和間接服務的政策界，以及部分服務使用者等都參與此盛會。以致，本研討會自年 2011 年 3 月開始籌備以來，至今已經有來自 187 個國家，100000 人次，55000 人造訪該會議網頁。據了解，此次會議約計 2000 多人參加，香港約計七十人參加，台灣則來自學術界、實務界，公部門等共計二十六人參加，並發表 22 篇論文（其中 12 篇口頭報告，10 篇海報報告），可謂陣容浩大。此會議也可以說是國際社福領域的相關專業人士每二年一次的國際盛事。

二、會議時間：2012 年 7 月 8 日～12 日

三、會議地點：斯得哥爾摩，瑞典

四、臺灣團隊成員：此次會議係由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統籌辦理，由該協會撰寫計畫書向政府單位尋求費用補助，由該協會理事長詹火生，秘書長翁毓秀老師等領軍帶領台灣社福相關專業人士參加，參加單位包括：

- 1.政府單位：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台北市社會局。
- 2.民間單位：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 3.學術單位：台大社工系，東吳社會系，師大社工系，亞洲社工系，中原特教系，輔大社工系，長榮社工系，靜宜社工兒福系，暨南大學社會政策暨社工系，政治大學社工系。
- 4.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五、會議心得：

(一)對實務社會工作者的衝擊和省思：

來自美國的學者—Fred H. Besthorn

主講的題目---Social Work And Environment

提到：20年前美國的 Kansas City (堪薩斯城)曾經因為天災摧毀變成一片廢墟，城市的居民大部分偏傳統而保守，可是在歷經此巨變，居民經過倡導和溝通，目前堪薩斯市卻變成全美國最綠化的都市。他以從事25年的社工經驗，語重心長的分享：我們應該對大自然多一些關心，也將會有更多的發現『Pay more attention the nature more the persons, something will profound.』他放了一段『對牛彈琴』的影片，提醒人類應該向動物多學習，當注意動物的習性，會發現大部分的動物會有以下特質：1.耐心 (Be Patient) 2.思考 (thinking) 3.傾聽 (listening) 4.觀察瞭解 (studying) 5. Quietly (安靜) 6. 團體行動 (cooperation)。

從他25年的社工經驗，他發現大部分社會工作者都工作量太重，休閒太少 (Work too hard, Play too little)，說太多話 (talk too much)，社會工作者應該多一點傾聽，同時要安靜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才能夠發現完整的自己，他同時也呼籲社工應該與其他專業合作，唯有團隊合作才能夠有更多的創新。我覺得這一段話應該可以給社工人很好的省思，我發現國內資深社工人員也有相同的問題，總是很焦急的對案主的問題說個不停，卻未能深入探討瞭解問題的源由。社會工作者應該常常保持『好奇 curiosity』，『多元 variety』，『可能性 possibility』的態度，將更能夠找到更好的答案。

(二)社會工作與人權 (Social Work & Human Right)

來自南非的教授—Vishantie Sewpaul 主講此議題，據說她是社福界的名教授，主張西方的社工理論無法適用於所有國家，社工理論和社工方法應該要本土化。

她提到：非洲在這一個世紀雖然在經濟，民主化都有很大的提升和進步，可是『人權在非洲』卻是一個爭議性的議題。聯合國也已經弱化了非洲 (UN has failed Africa!)，非洲目前還在為『殖民主義』奮鬥，文化被霸凌，天然資源被掠奪，所謂的民主選舉也因為貧窮而被政客操控，因此，她沈重的呼籲：社會工作者應該要承諾一定要『改變，扭轉，創造不同 making a difference』，一定要超越個案工作，轉而從事『倡導』，『遊說』，讓社會工作成為『人權專業 Human Rights' Profession』，讓社會工作者代表『弱勢的聲音 voice』，為了捍衛人權，要有勇氣

挑戰公權力，同時更應該跨界的結盟，並做為『相同』與『不同』的橋樑。

(Build alliance across borders, Build bridges acros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我覺得這位講者堅毅執著的對社工充滿了期許，如果國內的社工係學生或社工人員能夠瞭解社工可以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應該可以產生很大的激勵。

(三)不要忽視兒童的聲音

來自加拿大的學者—Cindy Blackstock

她引述 Shannen 的一段話：學校時期應該是提供夢想的階段，每一個孩子都應該享有這樣的時光。(School should be a time for dreams, every kids deserve this) Shannen 是一個原住民孩子，由於居住於偏遠地區，必須翻山越嶺才能夠上學，因此在 13 歲時曾經寫信給政府首長表達她的需求，後來加拿大政府就採用她的建議而建了一所學校，Shannen 雖然在 15 歲時因為車禍意外死亡，可是世人永遠記得她永不放棄爭取教育權的英勇事蹟。

『Do Something ! Reconciliation is not about charity, it is about respect and justice, You are not alone , kids stand up for kids, reconciliation needs you 』

鼓勵人們不要輕忽自己的力量，對不公不義的事，應該要勇敢站出來，為正義發聲，創造『不同』(make a difference)

(四)身心障礙者的人權

來自英國的學者--- Tom Shakerpeare

本身也是一個肢體障礙者，投入殘障 (disability) 領域已經有 20 年之久，他同時也是 WHO 倫理委員會的委員。目前全世界身心障礙人口大約佔全球人口數的 10%，亦即大約有 6.5 億人是屬於身心障礙者，而且還在不斷的成長中。身心障礙者一直未能受到平等的對待，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無論在經濟，社會，和人權等面向都受到嚴重的歧視。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困境包括：

- 1.沒有合理適當的標準
- 2.負面態度的對待
- 3.服務的提供不足
- 4.服務的輸送問題
- 5.沒有足夠的預算資金
- 6.缺少機會
- 7.缺乏參與和諮詢
- 8.缺乏資料和相關研究證據

他同時也播放一段影片，分享有一些肢體障礙者由於缺乏資訊，不知道該如何運用輪椅，因此只能被困在家裡，可是當被教會運用輪椅之後，他就行動自如，忘記自己是一個障礙者了。

2008 年 UN 通過身心障礙者人權憲章，主張身心障礙者應該擁有平等社會參與，就學，就業，就醫的機會，可是障礙者與貧窮確有很顯著的關連，兩者交互影響互為因果是不爭的事實，因此 Tom Shakerpeare 沈重的呼籲應該要進行更多的研究，蒐集資料，找出問題的原因，才能夠發展出國際性的身心障礙者幫助策略。

(五) 老人問題

人口老化是目前很多國家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台灣也同時面臨了這個問題。能夠活躍而尊嚴的老化 (Active and dignified Ageing)，能夠活到最後一刻 (To live until you die) 是目前老年人所追求的目標。

來自立陶宛的社會工作者分享了她的研究報告：她說立陶宛於 1990 年獨立，2004 年加入歐盟，由於經濟危機，以致影響了該國人民的平均餘命：因為經濟弱勢的老人沒錢購買服務，只能依賴親人的照顧，而公部門的長照服務由於人滿為患，也影響了照顧的品質。

相關研究也指出老人的心理社會適應問題應該被關照，老人的焦慮源自於對『照顧的恐懼更勝於對死亡的恐懼』。在英國待了 10 年，目前在英國大學教書的我國社會工作者～陳慧蓮分享：英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非常的重視個人權利，因此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下，老人的意見在長照服務計畫中必須被尊重，可是這樣的處遇計畫卻未能帶給長者最好的效果，她的研究建議表示：應該由政府部門，社工人員和長者一起做決定，才是對長者最好的處遇。

另外，瑞典的『長期照護』世界聞名，因此我也參訪了當地的二家機構，其中一家養護機構於 2011 年成立，以照顧輕重度失智症老人為主，目前收容 66 個老人，有看護，護理人員協助照顧，以及安排醫師每個星期二次來院看診，由於醫院就在旁邊，因此老人一嘔狀況即可送院治療。該養護中心非常乾淨，空間明亮，每一層樓提供簡易廚房和交誼廳，每一個老人單獨一個房間，房間佈置可依住院老人的想法，甚至可以將家裡常用的沙發椅子搬來，可謂非常的人性化。

另一家在斯得哥爾摩郊區的老人公寓~NAKA 是針對可自我照顧的老人所規劃的，是一房二廳一廚房的設計，公共洗衣間內甚至放了織布機，同時也設計了面對湖邊的交誼廳，圖書館，蒸汽室等，家家有陽台，戶戶有花園，公寓的中庭也是一個大花園，每個月舉辦一次 Party，同時還有繪畫班，游泳班，歌唱班等，接待我的長者是一個退休的大學教授，她說賣掉斯得哥爾摩的公寓，只花一半的錢就可以住在 NAKA 的公寓，不過每個月還需要繳交約新台幣 25000 元的管理費。

我覺得『活躍而尊嚴的老化』非常值得我們的學習。

(六) 就社工教育的部分

會議開場的主講者強調：2008 年的金融海嘯，影響銀行系統的崩垮，影響失業率大幅上升，亦即，財務危機影響經濟危機影響政治危機影響社會危機，這是環環相扣的，同時也有主講者呼應失業率每上升 1%，自殺和自虐率就增加 0.8%，車禍意外就增加 1.4%。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生活在貧窮線下的貧民，高齡人口，兒童，身心障礙，特殊境遇婦女等弱勢族群如何透過社會保護網得到基本人權保障是身為社福專業人員我們必須關注的議題。

個人深感國內的社工教育叫偏重微視個案，團體等社工方法，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等巨視面的學習較少，以及過度強化『同理』他人的處境，往往喪失思變的能力，也就流於扮演『補破網』的角色，如果能夠有能力倡導影響政策，應該更能夠解決服務使用者的問題。除此之外，大部分學者都無社工實務經驗，在學校封閉的環境下，失去對社會脈動的敏銳度，這些都可能影響社工教育的養成，以致社工係學生轉入機構工作需要較長的適應期和較多的訓練。

這一次有幸與國內從事社工教育的學者一起參加會議，衷心希望學術界能夠與實務界多交流，在英國當大學社工係講師的陳慧蓮說：在英國，社工的課程係邀請實務界，服務使用者，與學校老師共同討論訂定，她同時提到：英國的社會工作內容比較偏重個案管理，因此課程內容就偏重個人的瞭解和個人危機評估，與台灣有很大不同。

(七) 就大會內容，議程安排，形式等

我是第一次參加此會議，這真的是我參加過最盛大的學術研討會，一個二千多人的會議，議題內容多如牛毛，可是在緊湊的時間內，參加者也無法參與那麼

多場次的討論，尤其海報報告也來不及看，且由於參加者的多元性，容易流於對議題無法深入討論，同時因為會議太龐大了，主辦單位無法關照到很多細節，有很多場次的報告者甚至缺席情況嚴重，以及人數多，場地不容易安排，註冊要排很久，開幕式的致詞過於冗長等。

不過這樣的會議也促成了機構間的相互連結，例如有一個晚上安排了台灣團和香港團聯誼，香港團共計有 70 人參加，他們也覺得台灣和香港社福界的專業人士應該多多交流，香港社聯分享目前有很多大陸人到香港就讀社工，他們雖然對香港目前的處境不太樂觀，被限制言論自由，社福預算大幅刪減，社工人員的福利待遇下降，可是對大陸的民主化卻還蠻樂觀的。我同時也邀請他們來參加我們即將於 9 月在台北所舉辦的『亞洲 NGO 國際援助研討會』，他們也很樂意的表示想來參加。

六、結語：

我覺得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台灣在民主化，或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或非政府組織（NGO）的發展都是亞洲的資優生、模範生，台灣經驗應該可以分享提供亞洲國家做為借鏡，政府如果能夠多扶植我國社福、社工界參與國際會議並提升論文發表的能力，將擴增我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撰稿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江綺雯局長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係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以下簡稱總會)之團體會員，自 1999 年起，即配合總會出席全球會議(世界年會)及亞太區域會議，歷年均由局長、主任秘書、專門委員或相關科室主管人員代表參加，積極參與國際福利政策研討，相互交流國際社會福利的業務經驗，以為本市社會福利政策制定之參採。

2010 年第 33 屆國際社會福利協會全球會議改採由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國際社會工作聯盟(IASSW)、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三個具代表性的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國際組織共同合作，於香港主辦「2010 年世界大會」，共同制定全球發展綱領(global agenda lunched in Hong Kong ,2010)，以推動未來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今年「2012 年 ICSW 瑞典國際聯合會議」(以下簡稱大會)將力求使 2010 年世界大會的結論更具體化、更完善的發展，並付諸行動。本次大會的主軸為「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行動與展望」(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Action and Impact)，分別從實踐、政策及教育三方面進行，當中三大主題為：人權與社會平等、環境改變與可持續的社會發展、全球社會轉型與社會行動。探討議題涵括 21 個次子題：積極尊嚴的老化、婦女暴力、健康和社會平等權利、災害管理：社會工作和社會發展的觀點、對抗貧窮和發展社會保護、移民：挑戰和可能性、轉型中的家庭....等多元社會福利議題。為期掌握國際社會福利之發展趨勢，本市由綺雯本人代表出席本次大會，透過國際經驗的交流，分享本市社會福利工作之推動經驗，與各國代表建立友誼，進而提升本市國際能見度，拓展我國之國際網絡，接軌國際社會。

大會總共安排了 5 個全體會議、12 個專題討論會及 180 個研討工作坊，行程非常緊湊。來自超過 106 個國家的學者、實務工作者、非營利組織、政府機關...代表等，參與人數達到 1,100 人，在社會工作與發展領域中有著不同的專業人士齊聚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市，共同探討各項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的全球性議題。臺灣代表團出席參與本次會議人數共計 38 人，充份展現總會對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交流之重視及對此次盛會的支持。

本次臺灣代表團發表論文多達 29 篇，綺雯除了參與大會安排之全體會議、專題討論，並出席臺灣代表團論文發表的研討工作坊，此外，也選擇了「社會工作的領導統御」、「社會工作過程中的治理」、「社工的專業領導」、「社會工作實踐計劃」..等議題的論文發表與討論。惟大會安排場次過多，以致於無法全面及深入探討參與每個主題，交流回饋之時間不足，但仍分秒必爭，參加研討工作坊及加入機關參訪，簡列如下：

7/9	Social work leadership(社會工作之領導) Children in Care (兒童保護)
7/10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環境變遷與社會發展之因應) Disaster Management (災難管理) Visit-Children Care Center (訪問：兒童保護中心及諮商中心) Visit-Old Town (including Palace,Nobel Museum) (訪問舊城、含皇宮、諾貝爾博物館等)
7/11	Glob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Action (全球社會演變與社會行動) Education for Social Sustainability(社會演變下的教育) Elejercicio del trabajo Social(社會工作的演練-西班牙語國家專屬工作坊) Visit-Domestic Violence Center(訪問：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Visit-European Union : Street Men Service Center (訪問：歐盟遊民服務中心)

另外，除了參與前述各項會議外，有關大會安排的機構參訪是付費行程(每項機構參訪需額外付費約 700 元臺幣)，由於名額有限，因註冊前報名已滿，只好向背。然而幸運的是，獲得了總會秘書長翁毓秀教授贈與，讓綺雯有機會與來自 29 個國家的代表，共同參訪了 7/10 和 7/11 的二個機構：兒童保護服務中心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因而結交了多位國際友人，並進行彼此心得分享與經驗交流。尤其參訪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歐盟遊民服務中心」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二處機構時，對照本市相關社會政策及福利服務措施之異同後，有了不同的啟發，留下深刻印象，下面就上述二處機構分享參訪的經驗與心得：

1. 歐盟遊民服務中心 (Crossroads,Information Ochstod for utländska EU-migranter)

這裡是歐盟在北歐唯一的「國際遊民服務中心」。瑞典屬於歐盟體系，因經濟富裕，從歐盟體系 25 國來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找工作的人數不斷增加，有些求職不利的人，他們不能養活自己，也沒有足夠的錢或動力返回自己國家，最終留在瑞典無家可歸變成遊民。所以這裡的遊民中心可能面臨到必須服務來自不同的國家可能有多達 20 多種不同語言的遊民。「國際遊民服務中心」的經費由歐盟負擔 40%，瑞典斯德哥爾摩市(首都)負擔 60% (含市政府及 4 個基金會共同贊助)。該中心不提供遊民住宿，一般而言，夏季每日約服務 70 多人，冬季每日約服務 1 百多人。中心位在離首都捷運車程 30 分鐘的郊外，開放時間為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午 4 時，中心設有電腦室，提供遊民使用，每人每日限用 25 分鐘，遊民可以選擇自己使用的語言上網找工作，再透過中心的連結服務進一步協助重返職

場。中心提供遊民淋浴盥洗、洗衣設施等設備及 2 餐食物的服務，在這裡是採取制度性的管理與控制，例如規定每人沐浴限定 15 分鐘，中心對於遊民的飲食習慣也有一套計算與控制。

此外，斯德哥爾摩市有 8 處遊民收容中心是可以提供本國遊民住宿，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有 3 處遊民收容中心是提供藥毒酒癮的遊民住宿，也由於這類型中心型態的特殊，一般遊民不敢入住，但中心備有特別之設備，故不會有欺凌殘殺等事件的發生。瑞典的遊民照顧服務已相當制度化，且都是由政府在運轉，其服務內容和品質管控與臺北市相近，但在跨國際服務及輔導就業的連結上，或可作為我國跨縣市輔導遊民政策規劃之參考。

2. 斯德哥爾摩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The Domestic Violence Centre , Stockholm)

在瑞典，家暴的比例並不低，「家暴防治中心」是由國家和首都共同負責，從接案到分案及運作上，皆由政府掌理，沒有委請 NPO 辦理的項目，因為 NPO 在瑞典尚屬起步，應是福利高度國家化的結果。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在瑞典法令的制度設計下，家暴的處理系統，警察是第一線，1 位大隊長配置 1 位女性中隊長，接待我們的這位女性中隊長是黑人且具有多國語言的能力，中心的志工群相當多元，包含了律師、退休社工人員、老師，同時具有多種語言能力，能夠提供不同領域的智慧與貢獻。

最後，分享本次專題報告中一項重要且新的議題「社會工作與災難管理」(Social Work and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這個議題是探討社會發展和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影響。近年來全球暖化導致世界災難頻仍，如何透過政府的運作和社會福利社工的結合，共同因應災害所帶來的問題，它已成為國際共同關切的議題。報告中以美國 Kansas 州為例，肯州是全美龍捲風最多的地方，其中有一個城市 Green Burg 遭受了龍捲風的侵襲，滿目瘡痍，整個城市毀了，必須重新造鎮，居民捨不得離開他們的家園，希望集體在這裡重建家庭。最先提供服務的就是社會發展系統的人，他們花了 6 個月的時間，先是大學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系所的教授們開始研究別的國家城市如何災後重建的成敗經驗，此重建包括心理重建及家庭重建。一項項方案提出的建議，裡面包含有社工如何引用各項服務協助受災民眾，當面臨各方金援及物資進來時，什麼樣的資源(包含生活、心理各方面)是災民最需要也最適合的，對破碎的家園及生離死別的哀傷輔導以及社區鄰里支持系統的建置。

另建築師研究，各國建築物如何克服災變以及如何因應龍捲風的方法，他們研究出各種都市設計方案，並經過全民會議討論，大家規劃出自己的新城市，最後他們將這個城市命名為「Green Burg」(綠色城堡)，全面採用太陽能，因為，

全球暖化造成了龍捲風災難，所以他們要以身作則，宣誓環保的行動，親自愛地球、愛家園。現在這個城市已經重新建立起來，而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災難帶來的社會問題及社會重新發展是極為重要不容忽視的議題，為預防災難及處理災變，社會發展、社會工作與災難因應身心重建息息相關。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所引發的一連串天災，何嘗不是意味著大自然對於長期人為破壞環境的反撲和警示！

臺灣雖然沒上述龍捲風所帶來的災害，但處於高風險災害地區，震災、風災、水災、土石流..等災害近年屢屢重創臺灣，從九二一大地震到莫拉克風災所造成的 88 水災…多次重大災害造成家園摧毀。社會局於臺北市災害防救體制中，負責(1)救濟物資、民間捐贈物資及款項之備及應用；(2)福利機構及安養中心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3)受災民眾救助金之編列及發放；(4)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相關活動；(5)提供受災民眾關懷服務、福利諮詢與協助；以及(6)有關弱勢族群之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也就是說，面對災害防救工作，從災前整備、災中支援到善後重建等作業流程，皆依循處理「善後救濟」之原則，這次的專題啟示了社會局所承擔的新重責，即積極投入社工理念與行動，取代以往著重災後的救援與補助，進而加入身心靈復建，甚至遷村造鎮的行列。

這次瑞典盛會所呈現的社會工作與社會行動發展趨勢之各項議題，非常值得從事社會工作各種領域人士觀摩學習。社會局執掌社會福利服務之規劃與推展，舉凡救助服務、不同族群與對象之保護、支持、成長與發展等福利政策與措施、社區工作、志願服務等均屬業務範疇，可說包羅萬象，出席類此國際性社福會議，不但能與世界各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者直接交流，汲取創新理念與思維，更能以此檢視自我，行銷我國的優勢作為，此外，廣交各國同道建立友誼相輔相成，更是一大收穫。未來，本局仍將積極參與類此國際性會議，掌握世界社福發展的脈動與趨勢。

臺灣的國際困境-「臺灣」名稱-常遭打壓，二年前於香港舉辦之「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2010 年世界大會」，最初於報名系統中的國家選項「Taiwan」即遭到更名為「Chinese Taipei」，經過我國總會表達嚴正抗議後才獲得香港同意以自行輸入「Taiwan」的方式報名，然而後續仍發生臺灣發表之 23 篇論文遭到改為「Chinese Taipei」的矮化待遇。有別於前次會議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對待，此次瑞典會議已不復見，足見歐洲民主的成熟，著實令人欣慰。為了突破此類困境，我們必須更積極的參與國際性組織與世界會議，與世界接軌，才能維持臺灣在國際地位的能見度，爭取更多服務世界的機會。

撰稿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淑容老師

這次瑞典行主要是報告” A study of Employment obstacles among new poor families in Taiwan: ” 本研究主要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談針對四個新貧家庭的家計負擔者及個案相關網路工作人員等進行 16 次的深度訪談，並邀集政府勞政、社政單位以及民間機構實務工作者進行 2 場焦點團體，旨在探討(一) 探討新貧家庭的就業需求；(二) 新貧家庭的就業障礙；(三) 提出就業協助措施建議，供政策規劃的參考。研究發現受訪的四個個案可說都是由中產階級落入新貧的例子，亦提供了我們對此現象縮影的了解。就個案訪談資料綜合分析，研究獲致以下的結論：(一) 大環境不景氣是造成這些家庭陷入困境的主因，且新貧家庭落入困境是個多面向、動態歷程；(二) 主要家計負擔者的謀職障礙為中高齡、技能不足、與照顧責任；(三) 新貧家庭共同的需求：固定工作、輕減照顧負擔、住屋；(四) 新貧家庭多半家庭支持體系薄弱，亟需政府介入；(五) 新貧階級的主要家計負擔者不少為由中產階級向下落入新貧階級者，常需長時間的心理調適；而社會或相關工作人員，易將其標籤為「沒有工作意願」，對其「不配合」缺少包容，而不會積極介入協助。本研究最後對新貧家庭的就業需求與障礙，提出具體之就業協助措施建議。

此外還參加了三個場次及參觀三個機構：所參加的三個場次的研討會，擇其與個人研究興趣領域較相關者分述如下：

2012.7.9 下午 (WS050) Labour and Social Protection 「勞動與社會保障」場次

1. 來自 India Statistical Institute, Economic Research Unit 的 Pal, Manoranjan 報告” Poverty eradication programmes in India: actions taken and impacts made ” 本研究首先介紹印度的貧窮處境，報告者指出全世界 36%的窮人在印度。根據 2010 年的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印度的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為 0.519，排名全世界第 119 名。印度政府認為促進經濟成長，自然會使貧窮者受益，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印度近年來提出多種方案，如 The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Program(NREP) 以及 Rural Landless Employment Gurantee programmes (RLEGP)，試圖改善農村經濟的基本架構，為廣大的失業及低度就業的民眾製造就業機會。另有一些其他方案鎖定改善都會地區失業及低度就業者的貧窮處境。但該研究檢視這些方的成效，發現這些方案對農村級都市的基本架構有顯著的改善，但卻沒有能夠改善失業及低度就業的民眾的貧窮處境，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方案在消除貧窮上都只有暫時性的效果。
2. 來自英國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的 Pantaraki Maria 報告”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mposition of the SAP to the Greek welfare state and the

challenge to the Greek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報告者指出自從希臘於 2010 年 5 月因公債危機被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要求強制推行結構性調整方案(SAP,a structure adjustment program)後，希臘社經情勢急速惡化。根據 2011 年的人類發展指標報告(Human Development Index Report , UN, 2011)，希臘的排名由第 22 下降到第 29 名。希臘的貧窮率上升到 25%，失業率根據官方的統計為 12%，但非正式的統計據悉為 25%，而在有些區域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達 40%。民眾的社會需求增加，但福利國家卻面臨預算縮減的窘境，為社會工作專業帶來挑戰，尤其是社會工作專業組織。許多政府經費因推動結構性調整方案後移去彌補金融企業的虧損，使原有的社會福利預算因而減少，影響到弱勢族群的福利，也有許多社會福利機構已多個月發不出社工人員的薪水。報告者指出目前的決策機制在跨國的機構，而不在國內原有的政府與民間的社會夥伴關係，希臘社會工作者協會（the Greek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因此發揮社會工作中社會正義的價值與倡議的功能，帶領社會工作者走向街頭抗議，試圖喚起政府及民眾對此議題的重視。

3. Soares Silva, Marcela 報告” Degradation and barbarism under the mask of freedom: The policy of generation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the Era Lulu”

報告者指出根據 IPEA(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的估計，2010 巴西的就業市場應能產生 200 萬個就業機會，較 2009 年增加一倍，但同時期巴西卻仍然有 650 萬人失業。為了要因應資本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政府推出了許多創造就業與收入的措施期望能促進就業、增加所得、消除貧窮、減少弱勢族群並促進社會融合。但是以目前國際化的分工下，巴西公共就業的效果非常薄弱，報告者採取一種非常批判的態度，批評新上任的左派勞工政黨 Lulu 政府的相關的作為都只在於降低官方失業率的統計數字，增加當局者的政治光環，Lulu 政府把這些政策包裝的很好，讓外界認為彷彿勞工獲勝，但事實上相關措施所產生的就業機會都集中在非正式、及次級就業市場以及低薪資的工作，所謂的所得移轉充其量只是勞工階級內部的移轉，政府的措施只是粉飾其 ”剝削勞工” 的本質而已。她的批判引發了全場的激辯。

撰稿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秦燕老師

很高興有機會參與國際社會福利會中華民國總會率領的團隊出席 2012 國際聯合研討會: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行動與影響。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在我並不陌生，自 1995 年起，已有多次的經驗，但這次是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界第一次有計畫的推動國內學界、實務界參與國際事務，共同學習及將國內社工研究及實務成果向國際發表；也是我第一次帶領研究生共同在國際研討會中以英文口頭提報，在教學上也是一次新的挑戰和成功的經驗。

此次研討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2012.7.8-12 日，第一天 7 月 8 日註冊，開幕式及歡迎茶會一直到晚間 9 時，7 月 9-11 日三天密集的會議，12 日閉幕式。由於是 ICSW、IASSW、IFSW 三大世界性社會工作組織共同舉辦，規模龐大，共有 158 場口頭報告及 162 篇海報論文。地點在斯德哥爾摩近郊的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大會提供五日的免費交通證，可以自行搭火車、捷運、及公車。會展場所充分發揮環保及科技功能，有最大的演講廳，可容納全部一百零六國兩千五百名與會人員，有大大小小分場及公共活動室內、室外空間，同時段最高有 26 場發表。然而仍有較小型的會場因位置有限被阻於場外的遺憾。大部分的場地設備環境優良，但有少數會場鄰近公共空間，頂棚相通，隔音效果差，又不提供麥克風以免互相干擾，提報及討論受限，殊為可惜。

研討會報告分成三大類：一、人權與社會公平；二、環境變遷與社會發展；三、全球化的社會轉變與社會行動。我和張允閔研究生的論文發表以“台灣社會工作倫理課程的現況與發展”為題，參與第二類第六項：現行社會發展：研究、教育與實務。

這次研討會，台灣共有三十餘篇論文，二十位參團共同進出，不論個人或團隊的學習收穫都非常豐富，特別感謝內政部社會司的支持，社會福利國際學會台灣分會的統合及促成。有機會追隨詹火生老師、翁毓秀秘書長參與國際盛會是莫大的榮幸和難得的體驗，也期待台灣能在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的不斷發展提升下，也能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甚至未來引領風潮。

陸、照片剪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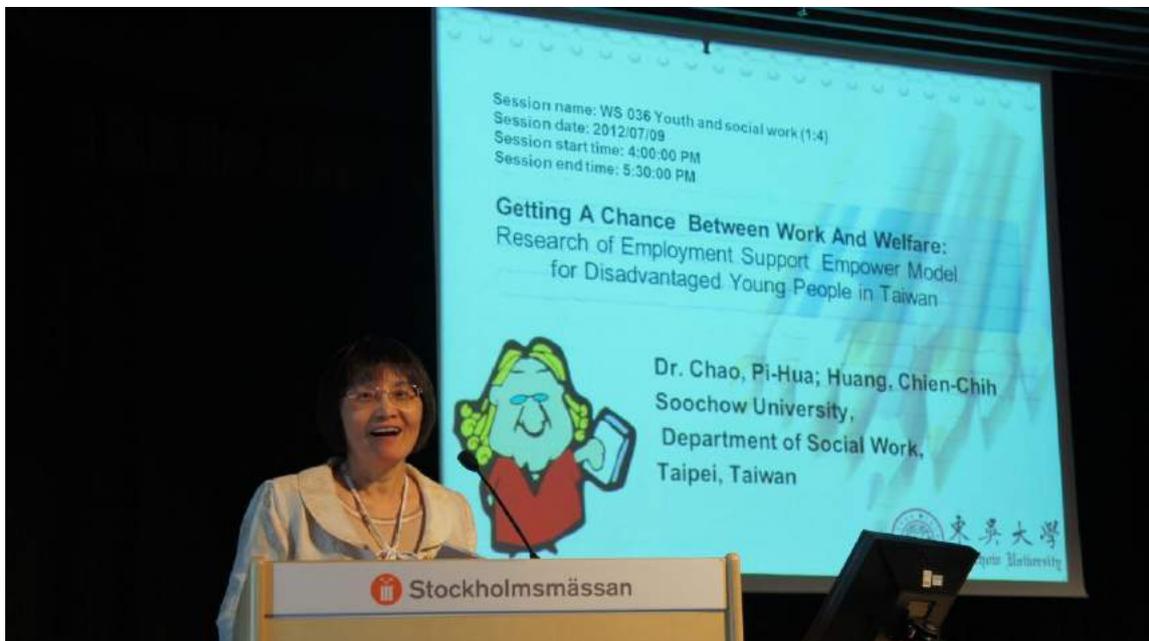
團員出席大會開幕



報告現場實錄



報告現場實錄



報告現場實錄



會議現場交換意見



會議現場交換意見



詹火生理事長與團員們合影



本代表團由詹火生理事長帶領



團員會後晚宴



團員會後晚宴



詹火生理事長與團員們合影



詹火生理事長與團員們合影

附錄 臺灣投稿文章摘要

WS005:8**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Does spirituality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Huang, Yu-Te¹; Chen, Yu-Wen²**¹Psychiatric department at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Kaohsiung, Taiwan; ²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aipei, Taiwan*

In recent years,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star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spirituality on individual well-being. Spiritualit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holistic health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dimensions of health. Spiritual growth helps individuals to seek the meaning of life, to develop positive self-identity, and to build up successful interpersonal skills. Adolescents experience tremendous life stress and are vulnerable to the depressive mood. It's imperative to identify possible risk factors. However, resilience perspective indicate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tective factors that could mitigate the impact of risk. Spirituality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 that helps to enhance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in face of adversity. However, in Taiwan, the idea of pursuing spirituality during adolescence is neglected. Research related to adolescent spirituality in Taiwan is also very limited.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fill the gap by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spirituality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in Taiwan, especially when adolescents are suffering stresses from family conflict, poor economic status, peer relationship, and academic expectation. The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respondents.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in the group setting. A total of 1,307 Taiwanese students from 10 to 12 grad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1,203 questionnaires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were included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and self-esteem, life stresses and spiritu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dea of spiritualit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helping depressive adolescents.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spirituality should be examined mor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enhance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

WS016:3

Birth families as strangers?- The family reunification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leaving care in Taiwan

Pong, Su-Hwa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Taipei, Taiwan

Children's home or residential placement has existed for centuries;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emphasized, as it should b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found and perceived by the governmental sector and academic area during these year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concerning leaving care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care leavers are limited. Some research on the outcomes in and after care indicated that care leavers are still in an inferiority status. Compared to other youths, care leavers have l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r unemployment, more likely to be homeless in adulthood, loneliness, young parenthood, dependent on state benefits, higher levels of alcohol/drug abuse, in trouble with the law, involved with psychiatric services, and poorer physical health, etc. The family reunification model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priority if children are stayed in the out-of-home placement in Taiwan. However, the reunification experiences of these care leavers are unknown and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methods are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to get multi-dimensional and rich information. Forty-three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irty care leavers are the informants in this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vulne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 leave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family reunification model did not get its priority status as it should be in Taiwan, thus children after care might have troubles in staying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when they returned home or be forced to living independently. The word 'strangers' is emerged from the interview to describ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birth families. These children are vulnerable in care and after.

Some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to reshape and modify our service system toward care leavers. Both public sector and not-for-profit sector should build up a partner working team to deliver the whole service for these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need. Leaving care policy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so are the regulations and guidance of leaving care in Taiwan. Hopefully, children in care and after can benefit from our leaving care system in the recent future.

WS030:7

Research of employment support empower model for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in Taiwan

Chao, Pi-Hua; Kao, An-Yuan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Taipei, Taiwan

Getting a chance between work and welfare?----Research of employment support empower model for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in Taiwa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1,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aiwan young people (aged 15 to 24) was 12% in contrast to the 7% for adults (aged 25 and over). The Forces such as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and familial or demographic changes, have altered traditional pathways from family and school into independent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further study or employment. Youth were hit disproportionately hard by the recession. The author asks an important question: Youth who are neither under employment nor in education/training are at high risk of marginalization and excluded from the labor market. The longer they remained unemployed, the higher the risk. This report examines the types of supports offered by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orking with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There is a high risk of persistence or growth in the hard-core group of youth who are left behind, facing po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rospects.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who leave school early and have low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are at risk of being engaged in marginal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include:

1. How these disadvantages have affected their abilities to progress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models of support they have or the helps and empowerment they would like to receive.
 2. to find risk factors :The effects of a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s abilities to progress in current condition of labor market.
 3. What support structure is currently available to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and how it matches up their needs.
 4. the various employment strategies to link work and welfare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social welfare system.
-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used for current and future policy- decision.

WS036:4

Getting a chance between work and welfare: research of employment support empower model for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in Taiwan

Chao, Pi-Hua¹; Kao, An-Yuan²

1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Taipei, Taiwan; 2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aipei, Taiwa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1,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aiwan young people (aged 15 to 24) was 12% in contrast to the 7% for adults (aged 25 and over). The Forces such as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and familial or demographic changes, have altered traditional pathways from family and school into independent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further study or employment. Youth were hit disproportionately hard by the recession. The author asks an important question: Youth who are neither under employment nor in education/training are at high risk of marginalization and excluded from the labor market. The longer they remained unemployed, the higher the risk. This report examines the types of supports offered by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orking with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There is a high risk of persistence or growth in the hard-core group of youth who are left behind, facing po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rospects.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who leave school early and have low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are at risk of being engaged in marginal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include: 1. How these disadvantages have affected their abilities to progress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models of support they have or the helps and empowerment they would like to receive. 2. to find risk factors :The effects of a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s abilities to progress in current condition of labor market. 3. What support structure is currently available to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and how it matches up their needs. 4. the various employment strategies to link work and welfare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used for current and future policy- decision.

WS045:4

Social work ethics curriculum in Taiwa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in, Yen; Chang, Yun-Hung

Asia University, Social Work Department, Taichung, Taiwan

Backgrou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ork ethic in Taiwan began in 1950. Social Worker Law was promulgated in 1997, with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Social Work Code of Ethics to be announced next year in 1998. In 2008, Social Worker Law and Social Worker License Examination were both amended; then Social Work Code of Ethics was set by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and released by the government. Afterwards, it was popular for colleges to open Social Work Ethics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to hold Social Work Ethics Workshops and Case Conferences.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rchive and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Methodology: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the electronic database system of Ministry Education in Taiwan, this stud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ocial work ethics courses.

Findings:

(A) Western Social Work Ethics Education

American Council for Education of Social Work (CSWE, 2011) in 2011 amended the Education Policy and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EPAS) include the value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thical principles.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Boards (ASWB, 2011) published a guide to social work ethics course development.

(B) Social Work Ethics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first academic year in 2000 found 7 schools teaching social work ethics courses; in 2005, 15 schools; in 2008, 19 schools. In 2010, 22 from 27 social work schools offered Social Work Ethics Course in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16 of them made them required courses, and 6 of them elective courses. 10 social work schools offered such courses in graduate program. There were 38 instructors in total teaching social work ethics courses. Social work ethics education has call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ut in course designing, namely course nam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so on are inconsistent among universities. A wide range of multi-teaching methods can present schoo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for such a design to hav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find an overall well-organized consistency that leads to a consensu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programs and to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training system of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WS050:6

A study of employment obstacles among new poor families in Taiwan

Li, Shu Jung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aipei, Taiwan

Recently, due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ny local industrie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aiwan have shifted their production center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a result, Taiwan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ri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a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and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ew poor population. The study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Bureau of Labor Affairs to investigate the employment obstacles of the new poor families and the types of assistance these families needed from the government. This study us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Sixteen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breadwinners,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and social service and employment service workers of four new poor families. This study also conducted two focus groups on staff and worker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1) investigate the employment needs of new poor families, (2) investigate the employment obstacles of new poor families, and (3) suggest employment assistance measures and policies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After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our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we discover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economic recession is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families to fall into economic turmoil, not the individual families themselve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part of the new poor class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process. (2) Employment obstacles for the breadwinner include older age, lack of skills or expertise, and confined by care responsibility. (3) Assistance families need from the government include a steady job, assistance to reduce their care responsibilities, and housing subsidies. (4) These new poor families usually lack family support from extended families and are in great nee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5) Currently, the service delivery systems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verlap and are fragmented. (6) The breadwinner of the new poor families, after falling from middle class to the new poor class, needs long-term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dition, employment service workers often see them as a “lacking in work motivation” and are reluctant to assist them.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concludes with specific employment assistanc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S057:1

V-Men Campaign of GOH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 a project to transform men with gender-issue education

Kuo, Yuyin¹; Kuo, Yajeng¹; Lin, Lishan²

¹Garden of Hop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²National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Professor,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his paper is an empirical study on how to stop mal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y launching campaign designed for men. Previous studies have well documented that over 70%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s victims are women. Based on stat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serving these victims, GOH found educating men through campaign is one essential step to stop violenc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men to continue doing what the campaign taught them when it is over. Therefore, GOH has kept launching new campaigns such as Vagina Monologue, male college students' mind/ soul clubs, V-Men web community, in the hope to transform males by repeatedly helping them to understand the issu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employed for investigation in this paper. We interviewed a few male participants in our campaigns to obtain information regarding how they had been transformed. We also conducted focus group discussion with male college students. After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 we created training materials which re-define masculinity and applied them to male high school students. We also assess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ssu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in participating anti-gender-based-violence campaign. Our results show that variety of campaigns did help males gain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gender issues and they were more willing to support anti-violence campaign.

Note:

What is V-Men? "V" originates from the world-famous play Vagina Monologue which promoted a so-called "V-day" campaign to stop violence. GOH came up with a "V" slogan in 2011- Valentine, Vagina, Violence, and Victory, advocating no violence but vagina friendly behavior between lovers (valentine) to build a winwin (victory) intimate relationship. V-Men include anyone who cherishes women and takes action to stop gender-based violence.

WS060:8**Core culture or minority culture? Rethink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Lin, Jen-Jen**Fu Jen University, Social Work, New Taipei City, Taiwan*

In 2009 Typhoon Morakot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with record breaking rainfall of 2,748 millimeters in 72 hours. Flooding caused the death of an estimated 699 persons, and relocation of 19,191 person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13,911 of the 19,191 relocated people were indigenous people. Theref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and cultural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dress some important cultural issues i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disaster. The results come from a case study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st affected village. This research is designed in particula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s to how ethnic minorities, who already suffer from an inequalit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more vulnerable to flooding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In the paper, I examine the tens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and village self organization by addressing four related issues. First, I briefly present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at characterized the indigenous villages of South Taiwan which were affected by Typhoon Morakot. Second, I analyze how the inhabitants of an affected indigenous village organized themselv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effort and which cultural conflicts were confronted. Third, I compare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used in this village and discuss their effects on the commun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I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sensitivity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offer a set of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survey revealed that community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The people who relocated after the disaster lost not only their homes, but also their culture and day-to-day life. This was especially so for indigenous people. Moreover the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housing policy for postdisaster recovery may well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core culture of privileged spheres. In interaction with indigenous people this led to a negation of their alternative local, minority cultural sphere, which in turn brought about a dis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dentity and posed a challeng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WS063:6

Who will decide my future? Children and youth talk about wellbeing

Shiao, Tsrong-chi; Li, Meng-chen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aichung, Taiwan*

In the making of child and youth welfare policy process, have those protagonists ever had consulted? What are their needs and demands? In this changing globalization era,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how to describe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in line with expectations of the children and youth.

In order to collect the children's and youth's opinions,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a survey with a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e population is the fifth to ninth-grade students in 21 Taiwan counties, the 2364 subjects were chosen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fter the survey process, 233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laimed. After data analysis through SPSS,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72% of the respondents conscious themselves in poor health status that in the recent month they were insomnia, abdominal pain, headache, dizziness or emotional instability, among the respondents, the youth show more obvious symptoms than the children.

The uncomfortable feeling derived from five main stress: (1)public order and criminal problems; (2)school bullying; (3)heard of sexual assault; (4)changing curriculum planning; (5)examination and academic pressure. 93% of the respondents show their highly expectation to take part in the children and youth welfare policies making process, however, only 28% of them had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related discussion. Indespite of this, 60% of them believe their opinions will be accept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voices that the children and youth echo in this survey, the authors ma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ing: (1)promoting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2)improving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3)improving the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4)constructing social security network; (5)caring for the social variety.

WS085:7

Validation of Taiw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 TIPVDA

Wang, Pei-ling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ntou, Taiwan

The TIPVDA is an instrument designed to assess the likelihood of lethality or near lethality occurring in a cas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use for the TIPVDA. Based on reviewing literature, exited danger assessment instruments, archival information of 80 femicide and attempted femicide cases, and discussing with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pool of potential predictors, and formed a questionnaire. The samples (N=773) are intimate partner victims who asked for help from police precincts and hospitals in 22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es, a 15 items scale was constructed and named Taiw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 (TIPVDA). This instrument was then tested with an independent sampl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N=572).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IPVDA was administered reliably, and they provide significant evidence of the concurrent, discriminant,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f this instrume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the TIPVDA are discussed.

WS140:3

The danger met by youth and children in the cyber worl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ual exploitation inside

Pang, Chen-Chen

Garden of Hop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he main purpose in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danger that youth and children face in the cyber world. Meanwhile, it will probe the tricks taken by the pimps or brothel. With this analysis, it will help the public aware the situation that adults abduct youth and children and attract them into sex trade via the internet. As the law of Child and Youth Sexual Transaction Prevention Act enacted in 1995, the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ess children and youth were forced or sold to the sex industry in Taiwan compared with the days in the past. However, the issue of trafficking never ended but changed the outer forms. The adults use children's and youth's trust and simple thoughts, trapping them into sex trade. At the same time, with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ildren and youth are tending to be explored in the anonymous, hidden and non-distance cyber world. In the mean time, it provides them the unlimited opportunities to befriend with others, which also being the access to be sex abused or having sex trade by deceptions.

The study is conducted by the interview of focus group and content analysis as well. From year 2009 to 2010,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has hired the social worker as participant observer in online chat rooms and online dating sites. Hence, the study will interview the observers and analyze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chat room. There are two part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one is to signify the message implying sexual messages that may affect children and youth in the cyber world; second is to clarify the tricks and statement that pimps or brothel may use to abduct children and youth into sex trade. Moreover, the situations of sex abuse will be discussed then. The research will help us catch the realities in the cyber world.

WS140:6

The study of structural violence of sex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tioners who were sexually exploited children and youth

Hung, Yali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has long existed in every society. Research concerning this issue i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victims' personal and family factors; therefore, the proposed resolutions are centering around consol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Based on its 20 years' experience in serving these victims in Taiwan, GOH has found that 'structural violence' is the key factor that caused them to enter sex industry. However, there is lack of research that investigates this factor.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facilitating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and propose a resolution in public policy making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reform.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d 14 practitioners- social workers or mentors who were or are employed by GOH. They all had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erving sexually exploited children and youth. Focus group method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tructural violence. There were two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first one was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ctims' life experiences; the second was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of the children and youth. We found that the sexually exploited children and youth have experienced varieties of structural oppression including negative family conditions, exclusion from educational system, crisis of personal health, financial hardship, difficulty in establish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 and broken marriage. Above all, the structural oppression from labor market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leave the sex indust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ocial structure factors that cause/worsen the problem of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We also recommend solutions for policy makers in terms of social welfare reform and treatment for the victims.

WS148:5

Experiences of “Love Makes Whole” international cleft programs

Noordhoff, Samuel1; Wang, Rebecca2

1Noordhoff Craniofacial Foundation, Founder, Taipei, United States;

2Noordhoff Craniofacial Foundatio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Taipei, Taiwan

Introduction: Since 1998, the Noordhoff Craniofacial Foundation (NCF) along with the Chang Gung Craniofacial Center (CGCFC) have cooperated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programs for the treatment of cleft lip and palate patients. This included medical mission programs, training seed doctors, and establishing centers of excellence i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holistic comprehensive team approach is stressed based on the Chinese proverb: “Teach them how to fish rather than give them fish”. From 1998 through 2011, the NCF has sponsored 120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16 countries, the professionals are including surgeons, orthodontists, anesthesiologists, speech therapists, nurses, and coordinators for training in the CGCFC. NCF organizes 57 overseas medical missions to Vietnam, Philippines, Cambodia, China, Dominic Republic, Indonesia, Myanmar, Laos and Mongolia for the past 14 years; 1,568 patients were treatment for free with good result.

In 2005 NCF did a study to evaluat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left Program, The followings are the purpose, method and results of the study.

Purpose: To evaluat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s of the NCF/CGCFC International Cleft Program.

Method: Qualitative in 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Selected participants included seed doctors, personnel of the CGCFC,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Results: “Love Makes Whole” model was implemented in Cambodia, the Philippines and Shenzhen China.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gram included:

- (1) Cooperation and same vis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 (2) Administrative support of the hospital
- (3) Institutional problem of the local hospital
- (4) Language barriers
- (5)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mportant concepts:

- (1) Establishing standard treatment protocol
- (2) Establishing audit procedures for quality control and education
- (3) Continued education programs
- (4) Training social workers to link local resources to the cleft centers
- (5) Developing outpatient follow up procedures, patient and family.

WS156:5

The new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Tai, Shih-Mei¹; Ou, Ya-Wen²; Jhao, Shun-Da²

¹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Dept., Miaoli City,

Taiwan; ²Penghu County Service Center of New Residents, , Penghu County, Taiwan

In order to be able to get close to new residents (as known as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Penghu County Service Center of New Residents conducted this research. It was implemented from May to July 2011 to understand the new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cluding 4 components: (1)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2) the interaction with community residents, (3) the acceptance of multi-culture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4) the new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was adap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survey, 250 new residences' perceptions gathered in five rural areas and one city in Penghu County. After data analysis with SPSS, the key findings are: (1) New Residents' living area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erceptions of local communities; (2) the higher level of community acceptance for cultural diversity, the better New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the better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3) to set up an accessible local-helpers network to support the New Residen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future.

WS157:3

The parenting stres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mothers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children

Weng, Betty

Providence University, Social Work & Child Welfare, Taichung City, Taiwan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children to grow up at their various developmental stages. Parents are their providers to fulfill their developmental needs.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re counting on their parents to provide adequate environment to achieve their developmental goals. Parenting stress is the stress of playing the parenting roles. Since most of the time, mothers are the major care-givers, therefore, mothers are usually the research subjects. Taking care of normal children is a long term high stress job already, bringing up a special child can be a devastating and frustrating task. From family system theory point of view, high parenting stress will affect the interaction in the family.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is measuring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marital interaction. Caring for a developmental delay child may have higher parenting stress. High marital satisfaction may help to reduce the parenting stress, but low marital satisfaction may even increase the parenting stress.

This i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using a questionnaire as the tool to gather necessary data.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mothers with developmental children. The research intend to find out: 1. How is the parenting stress situation of the mothers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children? 2. How is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these mothers? 3. How parenting stres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these mothers are related? At the end, basing on the findings, concret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actitioners will be proposed.

